

## 聯合東方無產階級—— 1927年英國工人運動領袖湯姆曼之訪華

李 戡

摘 要

1927年2月，共產國際派出國際工人代表團（International Workers' Delegation）訪問中國，考察中國革命局勢，代表團的領軍人物——湯姆曼（Tom Mann）、多里略（Jacques Doriot）、白勞德（Earl Browder），分別為英國、法國、美國聲望極高的工人運動領袖。代表團抵達中國時正逢國民黨「寧漢分裂」，國民黨左派與中共黨員主導的武漢中央，對國際工人代表團的到訪極為重視，不僅安排代表團在廣東、江西、湖北、湖南四省考察，又在武漢舉辦盛大歡迎宴會，以壯聲勢。與此同時，中共在共產國際的指示下，將反英運動作為外交核心政策，湯姆曼身為英國無產階級的代表，在中國現身說法、帶頭抨擊英帝國主義，所到之處無不大受歡迎。本文以湯姆曼為視角，使用英國華威大學（University of Warwick）近代史料中心（Modern Record Centre）所藏的湯姆曼檔案、英國國家檔案館所藏的外交部門檔案（Foreign Office Files），以及國民黨黨史館的相關材料，探究代表團在中國的行程以及歷史意義。

關鍵詞：湯姆曼、國際工人代表團、共產國際、中國國民黨、中國共產黨



# Allying the Proletariat in the East: Tom Mann's Visit to China in 1927

Kan Lee\*

## Abstract

In February 1927, the Comintern arranged for an International Workers' Delegation to visit China. Three delegates in the Delegation, Tom Mann from England, Jacques Doriot from France, and Earl Browder from the United States, were prominent trade unionists with great esteem. Representing the communist parties in these three countries, their mission, under the direction of the Comintern, was to investigate and assist the revolution in China. Due to its political significance, the Delegation was received with enthusiasm by the Guomindang leftists and Chinese Communists in Wuhan, who were competing for power and legitimacy in the revolution with the Guomindang rightists at the time. The Delegation attended mass rallies in Wuhan and toured the provinces of Guangdong, Jiangxi, Hubei and Hunan. As a representative of the British Communist Party who strongly opposed British imperialism in China, Tom Mann soon became a popular figure in China as the anti-imperialist movement targeting England was vehemently under way. Using the Tom Mann Papers preserved at the Modern Record Centre of the University of Warwick, the British Foreign Office files, and documents at the Guomindang archives,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om Mann's role in the Delegation during its visit to China as well as the historical meaning of that visit.

**Keywords:** Tom Mann, International Workers' Delegation, The Comintern, The Guomindang,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

\* Postdoctoral Fellow,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 聯合東方無產階級—— 1927年英國工人運動領袖湯姆曼之訪華\*

李 戡\*\*

## 壹、前言

1941年3月17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致電英國共產黨，吊唁3月13日85歲離世的湯姆曼<sup>1</sup>：

湯姆·曼逝世的消息，是使中國工人階級和中國人民甚感哀痛的消息。湯姆·曼不僅是英國工人階級的領袖，還是歐、美、非、澳及亞洲許多國家的工人運動的直接參加者。我們還能清楚的記憶，湯姆·曼在一九二七年以英國工人階級的代表地位，參加國際工人代表團來華，受到中國工人階級前所未有的熱烈歡迎的情景。他的來華，使中國工人階級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和國際團結，更向前發展，他的來華，使中英兩國的工人和人民的戰鬥的團結，更趨密切。在抗日戰爭中的中國工人和人民，將更高舉湯姆·曼所象徵的鬥爭，國際團結，獻身於工人階級和被壓迫民族的解放事業的大旗，緊密兩國工人階級及人民的團結，爭取澈底解放的勝利。<sup>2</sup>

---

\* 感謝審查人惠賜意見，謹致謝忱。

收稿日期：2023年10月30日；通過刊登日期：2024年1月13日。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

<sup>1</sup> 此處採當年中文報紙使用的譯名，湯姆曼則包含姓氏與名字。

<sup>2</sup> 〈中共中央唁電〉，《新華日報》，重慶，1941年3月17日，版1。

1941年的中共高層中，親身參與1927年國際工人代表團活動者已寥寥可數。當年的工人運動領袖，蘇兆徵病故、向忠發與鄧中夏遭國民黨槍決、李立三被流放至莫斯科，涉入1927年武漢國民政府運作的中共黨員中，張國燾、周佛海均已脫離中共，至於毛澤東，代表團來訪期間雖與湯姆曼共同出席3場活動，但據現有史料顯示，兩人並未有直接互動。<sup>3</sup> 換言之，1941年當下就工人運動與湯姆曼有過交集的中共高層中，只有劉少奇一人，而中共中央能回想起1927年代表團到訪一事，也極可能與劉少奇有關。從這封唁電可知，中共中央將湯姆曼的來訪，視為馬克思主義「工人無祖國」、「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等概念的重要案例。

1927年2月國際工人代表團到訪中國時，正逢國共兩黨合作展開北伐軍事行動的高潮。北伐的基礎，源自1923年孫中山為取得共產國際援助，同意中共黨員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以便共同實現打倒北洋軍閥和帝國主義的目標。1924年1月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召開，開啟了兩黨的正式合作，多名中共黨員獲選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參與各部門的具體運作。<sup>4</sup> 起初，兩黨儘管摩擦不斷，但仍在群眾運動的發展上取得重大突破，1925年的五卅運動與省港大罷工掀起工人運動的高潮，為日後的軍事北伐奠下基礎。1926年3月廣東廣西統一後，蔣介石於7月發動北伐，年底攻克武漢與南昌等戰略要地。1927年初，蔣介石決定在南昌另立中央，與遷往武漢的國民黨中央分庭抗禮。在武漢的國民黨中央，實由國民黨左派與中共黨員控制全局，因而在外交與經濟政策上聽從共產國際的指示。共產國際要求中共貫徹反帝國主義與動員工農群眾北伐的方針，故國際工人代表團的到訪，給中共當下針對英國的反帝運動帶來極大的宣傳價值，中共黨史將代表團來華視為執行1926年12月共產國際第七次擴大會議對中國問題的新決議，其目的為「搜集帝國主義侵華的暴行，以便發動國際無產階級反對帝國主義武裝干涉中國革命；第二，動員各國工農群眾幫助中國革命走向勝利」。<sup>5</sup> 然而，到了1941年，日本早已取代英國，成為蘇聯和中共對抗之目標，故這封唁電巧妙迴避了湯姆曼來華時中共的真實態度，改以符合抗日宣傳的論調。

<sup>3</sup>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上卷（北京：中共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頁188-196。

<sup>4</sup>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編，《國共關係簡史》（臺北：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1983年），頁44-46。

<sup>5</sup> 黃修榮，《國共關係史》，上卷（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2002年），頁661。

1927年國際工人代表團來華，無疑是中共參與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經典案例之一。但令人意外的是，中國大陸無論在中共黨史、工人運動史、國共關係史，甚至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領域，幾乎未曾注意此事。對國民黨而言，因1927年中共發動的工農運動往往被視為國共合作失敗的導火線，故其同立場的代表性著作《從容共到清黨》和《鮑羅廷與武漢政權》兩書，均引用大量國民黨黨史館檔案，重點介紹中共領導群眾運動的「過火」行為，並未提及國際工人代表團到訪一事。在西方世界，數十年前即有人注意到代表團來華的重要性，伊羅生（Harold Issacs）的《中國革命的悲劇》（*The Traged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書中引用代表團成員撰寫的文章與報告，大致還原了代表團在中國親歷的重大事件。<sup>6</sup> 由於陪同代表團來華者，尚有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羅易（M. N. Roy），而羅易在中國停留期間的作為，特別是擅自將1927年5月的莫斯科指示透露給汪精衛導致後者在7月發起的武漢分共，往往被視為國共合作終結的關鍵因素之一，因此羅易在中國的角色一度引起學界重視，而相關研究均順帶介紹國際工人代表團的行程，如諾斯（Robert C. North）在《羅易在中國的任務》（*M. N. Roy's Mission to China*）一書中，介紹羅易在國共分裂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但對代表團任務性質的分析與事實出入甚大。<sup>7</sup> 中國大陸學者在文章中引用卡爾尼克（V. B. Karnik）撰寫的《羅易的政治傳記》（*M. N. Roy: Political Biography*）介紹羅易的中國行，然不少細節均有錯誤。<sup>8</sup>

<sup>6</sup> Harold Isaacs, *The Traged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p. 161.

<sup>7</sup> 該書指出，多里略與湯姆曼陪同羅易前往中國的目的為「參加第四次全國勞動大會」。然而，這並非國際工人代表團被賦予的主要任務。見Robert C. North and Xernia J. Eudin, *M. N. Roy's Mission to China: The Communist-Kuomintang Split of 1927*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3), p. 44.

<sup>8</sup> 如陳峰君文中稱多里略為德國人、代表團並未計劃乘坐飛機從廣州前往漢口、4月1日代表團在武漢而非長沙，見陳峰君，〈馬·納·羅易與中國〉，《南亞研究季刊》，1987年3期（1987年10月），頁60。英文原版見V. B. Karnik, *M. N. Roy: Political Biography* (Nav Jagriti Samaj, 1978).

事實上，湯姆曼結束中國訪問回到英國後，立刻出版《我在中國之所見》（*What I Saw in China*）一書，代表團另一位成員白勞德也在同年出版《國民黨中國的內戰》（*Civil War in Nationalist China*）一書。儘管兩書皆為數十頁的小冊，但其內容之精彩、視角之獨特，不僅能填補羅易自身回憶的空白，更是研究北伐時期的中國近代史極為特殊的史料。<sup>9</sup> 可惜的是，上述兩本小冊幾未引起中文學界的關注，目前僅有謝諾（Jean Chesneaux）在《1919至1927年的中國工人運動》（*Le mouvement ouvrier Chinois de 1919 à 1927*）一書中引用湯姆曼著作，略述該訪問團的政治意義。<sup>10</sup> 賈克伯斯（Dan N. Jacobs）在《鮑羅廷：史達林派到中國的人》（*Borodin: Stalin's Man in China*）一書中，同樣引用湯姆曼的這本小冊，介紹代表團訪問湖南見識到的群眾運動。<sup>11</sup> 至於在英國工人運動史研究領域，因湯姆曼訪問中國時已經71歲，早已遠離英國政治運動，故相關討論悉數集中在湯姆曼1889年領導倫敦港口罷工的歷史。<sup>12</sup> 即便針對湯姆曼的人物研究，也多半省略湯姆曼的晚年生活，如馬克思主義史學家托納多爾（Tona Torr）研究湯姆曼的經典著作《湯姆曼和他的時代》（*Tom Mann and His Times*），就將時間下限設在1889年。<sup>13</sup> 儘管如此，仍有學者注意到湯姆曼1927年中國行的重大政治意義，日本著名社會思想史學者都築忠七訪問中國一事作為湯姆曼暮年生涯的3項「最後任務」之一。都築忠七使用湯姆曼在中國書寫的家信，比伊羅生更加具體地還原了代表團在中國的行程，並追溯湯姆曼早年領導英國工人運動的經歷，如何轉變為對中國反帝運動的同情，為湯姆曼對中國革命的狂熱做出了具有信服力的解釋。略顯不足的是，由於受研究性質所限，該書並未進一步考察國

<sup>9</sup> 關於白勞德的研究，參見James Gilbert Ryan, *Earl Browder: The Failure of American Communism* (Tuscaloosa, Ala.: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 1997). 關於多里略的研究，參見Jean-Paul Brunet, Jacques Doriot, *Du Communisme Au Fascism* (Paris: Balland, 1986).

<sup>10</sup> Jean Chesneaux, *Le mouvement ouvrier Chinois de 1919 à 1927* (Paris: Mouton, 1962), pp. 481-516.

<sup>11</sup> Dan N. Jacobs, *Borodin: Stalin's Man in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p. 265.

<sup>12</sup> John Lovell, *Stevedores and Dockers: A Study of Trade Unionism in the Port of London, 1870-1914* (New York: Augustus M. Kelley, 1969); David Powell, *British Politics and The Labour Question, 1868-1990*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2), pp. 15-16.

<sup>13</sup> Dona Torr, *Tom Mann and His Times*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56).



共兩黨對湯姆曼在中國訪問期間的反應，以及相應的政治意義。<sup>14</sup> 本文從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與國共關係史的視角出發，透過中、英史料重新審視國際工人代表團的中國行，探討其反映出的多重政治意義。

## 貳、湯姆曼的工人運動經歷與代表團成立經過

湯姆曼於1856年出生在英國工業重鎮考文垂（Coventry），先後從事礦工與工廠學徒。1881年接觸亨利喬治（Henry George）的書後，開始關注社會層面問題，逐步走上社會主義的道路。<sup>15</sup> 1884年，湯姆曼加入社會民主聯盟（Social Democratic Federation），目標為爭取8小時工作制。1889年，湯姆曼領導英國轟動一時的碼頭大罷工（London Dock Strike）。<sup>16</sup> 恩格斯對這場罷工描述道：「這是我們近年來最有希望的一次運動，我還能看到這次運動，感到很自豪，很高興。如果馬克思還活著並親眼看到這種情景，那該多好啊！」<sup>17</sup> 1894年湯姆曼成為英國獨立工黨（Independent Labor Party）的書記，專注於組織工會運動，由於未能團結其他社會主義團體，加上群眾基礎有限，故在議會選舉中遲遲無法取得突破。1896年，湯姆曼組織國際運輸工人聯盟（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Transport Workers），實踐聯合世界工人的構想。

此後，湯姆曼的行動跨越國界，先後在西歐多個國家參與工會組織，但遭當局逮捕遣返。1901-1910年湯姆曼到紐西蘭、澳洲和南非「輸出革命」，回到英國後，投入組織工團主義（Syndicalist）路線。<sup>18</sup> 1911年，湯姆曼在文章中呼

<sup>14</sup> Chushichi Tsuzuki, *Tom Mann, 1856-1941: The Challenges of Labou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sup>15</sup> A. L. Morton and George Tate, *The British Labour Movement, 1770-1920: A History* (Westport, Conn.: Greenwood Press, 1975), p. 161.

<sup>16</sup> James Hinton, *Labour and Socialism: A History of the British Labour Movement, 1867-1974* (Brighton, Sussex: Wheatsheaf Books, 1983), p. 47.

<sup>17</sup>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著作編譯局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頁438。

<sup>18</sup> James Hilton, *Labour and Socialism: A History of the British Labour Movement, 1867-1974*, pp. 90-91.

籲建立有效的工會組織，「慢慢控制生產工具直到在全世界的無產階級都組織起來，剷除資本主義生產，這時候才能建立社會主義共和國，實現社會主義革命」。<sup>19</sup> 1916年湯姆曼加入英國社會主義黨（British Socialist Party），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爆發，思想日益趨向共產主義，並在1920年參與組建英國共產黨。共產國際此時已注意到，歐洲革命並未如預想般順利進行，為因應新的世界局勢，共產國際於1921年6月22日至7月12日召開第三次代表大會，重視東方民族的解放運動，如列寧所言：「在未來的世界革命的決戰中，占世界人口多數的人民的運動，最初是為爭取民族的解放，將來一定會轉而反對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它所起的革命作用，也許比我們所希望的要大得多。」<sup>20</sup> 湯姆曼代表英國共產黨出席大會，並在東方問題的議程上，以印度為案例發言。7月，湯姆曼又參加赤色職工國際成立大會，並獲選為大會主席團成員。<sup>21</sup> 除了更加看重東方問題，列寧也指示暫緩激進的共產主義運動，改以溫和手段替代，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的第一次合作，即在此背景下展開。1924年，湯姆曼作為英國代表參加共產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7月1日在關於民族和殖民地問題會議上發言。<sup>22</sup> 儘管此時湯姆曼在英國號召力已大不如前，但鑒於其豐富的工人運動經歷，仍被共產國際與赤色職工國際視為世界工人運動的重要人物。

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成立於上海，在接下來數年中，依照共產國際的指示嘗試推行工人運動，並以此作為反對帝國主義的手段。1923年中共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主張「以國民革命來解放被壓迫的中國民族，更進而加入世界革命，解放全世界的被壓迫民族和被壓迫的階級」。<sup>23</sup> 在中共領導下，工人運動在1925年的五卅運動與省港大罷工中取得重大突破，共產國際決心大力支持中國無產階級革命，並使之與世界革命發生聯繫。1926年3月20日的中山艦事變，以及

<sup>19</sup> A. L. Morton and George Tate, *The British Labour Movement, 1770-1920: A History*, p. 239。

<sup>20</sup> 列寧，〈關於俄共的策略的報告〉，收入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著作編譯局譯，《列寧全集》，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頁469。

<sup>21</sup> Chushichi Tsuzuki, *Tom Mann, 1856-1941: The Challenges of Labour*, p. 207.

<sup>22</sup> 王學東主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歷史文獻》（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5年），頁269。

<sup>23</sup> 〈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收入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頁139。

年中展開的北伐軍事行動，更使得共產國際亟欲掌控中國革命局勢。是年底共產國際召開第七次擴大會議，派遣羅易為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團首席代表。在決議文中，要求中共「加緊中國職工運動與世界職工運動的關係，對於遠東各國的職工運動，特別須密切聯絡」。<sup>24</sup> 除此之外，共產國際甚至給「帝國主義國內共產黨」下達任務，要求「用一切方法以擁護中國革命」其中包括：

- 一、反對武力干涉中國的煽動。對無產階級群眾解釋外國武力干涉中國的危機。帝國主義在中國鼓動內戰和給與軍閥以經濟與武備的幫助之事實，應該揭破。
- 二、要求外國海陸軍從中國撤退。
- 三、在駐華外國海陸軍中宣傳。
- 四、鼓煽立即承認廣州政府為中國真正的國民政府。<sup>25</sup>

對中國而言，帝國主義國家包括英、法、美、日等國，然而，在蘇聯與共產國際的認知裡，則刻意將西歐國家作為重點目標，其中英國首當其衝。共產國際採取雙管齊下的戰略，一方面要求中共與世界職工運動加強聯繫，一方面則指示帝國主義國內共產黨，援助中國革命。既要求兩者建立聯繫，共產國際決議組成由英美法3國工人領袖組成的工人訪問團，隨同羅易一前往中國。共產國際選擇英美法3國，背後帶有特殊的政治意義。英、法、美為列強在中國的代表，指派3國工人運動領袖出訪中國，目的是為了團結自身國家與中國群眾的聯繫，打擊共同敵人——帝國主義與資本主義。此舉最終目的，即象徵工人無祖國，無產階級革命不分國界，全球受壓迫階級團結起來為共同利益而奮鬥。

事實上，在共產國際下達指示以前，英國無產階級已表達對中國革命的同情與支持，其中以聲勢浩大的英國工黨（Labour Party）為代表。省港罷工後，英國工黨致電國民黨，「代表一百萬英國有組織的工人，祝賀貴黨繼續勝利。吾人

<sup>24</sup>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七次擴大全體會議關於中國題決議案〉，收入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檔案文獻選編》（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15年），頁110。

<sup>25</sup>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七次擴大全體會議關於中國題決議案〉，收入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檔案文獻選編》，頁111。

誠意祝貴黨對帝國主義侵略之反抗，宜與英國礦工之奮鬥一樣，請將吾人敬佩祝賀之情轉達國民革命軍。英國所有活動工人均非常注意國民革命軍之勝利」。<sup>26</sup> 儘管兩黨出發點同樣是關照工人階級利益、也同樣反對英帝國主義侵略中國，但工黨反對激進的共產主義，故共產國際的影響力所及，僅限於英國共產黨。1924年8月，英國共產黨成立全國少數派運動（National Minority Movement），吸收不願加入英國共產黨的工會積極分子，目標是將工人階級中的革命少數派轉化為多數派。廣州國民政府成立後，英國共產黨發起「不干涉中國」（Hands Off China）行動，湯姆曼以「少數派全國運動」名義組織群眾參與。<sup>27</sup> 因此，考量英國共產黨作為英國無產階級代表的正當性，以及英國代表必須具備對世界職工運動的基礎知識，湯姆曼成了共產國際心目中英國代表的最佳人選。

共產國際為湯姆曼指派的隨行翻譯阿基莫娃（V. V. Vishnyakova-Akimova）在回憶錄中解釋湯姆曼被選派為英國代表的原因：

這是一個身體硬朗、精神矍鑠的長者，個兒不高，鬚鬢如銀，頭上有一綵引人發笑的白髮。他留著長髯，兩眼炯炯有神。他的舉止是那樣灑脫自信，他的講話是那樣熱烈、果敢，誰也不會認為他已是七十一歲的高齡。湯姆·曼是冶金工人出身，自少年時代起就參加革命鬥爭。他是英國共產黨的元老。恩格斯稱他為英國無產階級最優秀的代表之一。湯姆·曼是英國少數派全國運動的名譽主席。他是作為這個運動的代表來中國的。這是英國工人的反對派運動，它反對英國全國職工聯合會領袖的叛賣政策。<sup>28</sup>

<sup>26</sup>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會第六十四次會議錄〉，收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國國民黨第一、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史料》，下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6年），頁697。

<sup>27</sup> Chushichi Tsuzuki, *Tom Mann, 1856-1941: The Challenges of Labour*, p. 222.

<sup>28</sup> 維什尼亞科娃·阿基莫娃著，王馳譯，《中國大革命見聞1925-1927：蘇聯駐華顧問團譯員的回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頁249-250；V. V. Vishnyakova-Akimova, *Two Years in Revolutionary China 1925-1927*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p. 29.

1927年1月19日，共產國際給代表團下達兩項任務：「一、表示西歐工人對中國勞動群眾的同情，宣傳中國民族解放運動和全世界無產階級革命鬥爭結成聯盟的思想。二、從中國返回後，在歐美有關國家掀起支持中國革命、反對帝國主義者在中國實行的掠奪政策的廣泛行動。」這兩項指示，基本上為共產國際第七次擴大會議對中國問題決議的延續，最值得注意的，卻是規定代表團成員以何種名義在中國發表談話的指示：

責成代表團不得以共產國際執委會名義發表講話。代表團每個成員都作為本國工人階級的代表發表講話，把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本國政府的壓迫政策上，並把這一點與世界帝國主義對其他東方國家的政策和對正面臨新的武裝干涉威脅的蘇聯的政策聯繫起來。<sup>29</sup>

共產國際此舉目的係為凸顯代表團成員代表自身國家工人階級，進而為帝國主義國家受剝削階級將大力援助中國革命的說法，使中國群眾聽來具有說服力。除此之外，共產國際還建議代表團「在了解中國共產黨的工作時不要直接對中國共產黨的黨組織或黨員進行指導和作指示」、「要與共產國際執委會駐中國代表和鮑羅廷同志協商它在中國的工作計畫和發言性質」、「首先應訪問國民革命政府管轄的以下工人中心：漢口、漢陽、武昌和廣州，如有可能，還可以訪問孫傳芳統治下的上海」、「不去訪問有危險的場所」、「選定的路線應避開哈爾濱，也就是赤塔、伯力、海參崴。應從海參崴乘蘇聯輪船直接去漢口」。<sup>30</sup> 這些建議既保證代表團成員的人身安全，又不使代表團的特殊身分妨礙鮑羅廷與中共的工作方針。儘管如此，鑒於湯姆曼的高知名度，英國駐華領事館對湯姆曼一行人的到訪始終保持高度警戒。

<sup>29</sup>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書記處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赴中國代表團的指示〉（1927年1月19日），收入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檔案文獻選編》，頁122。

<sup>30</sup>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書記處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赴中國代表團的指示〉（1927年1月19日），收入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檔案文獻選編》，頁122-123。



### 叁、廣東、江西與湖南考察

啟程訪問中國前，湯姆曼對中國一無所知，在其1923年出版的回憶錄中，甚至隻字未提中國。湯姆曼與亞洲國家的唯一交集，僅有在共產國際三大「討論東方問題」議程上以印度為例發言，「在英國占統治地位的資產階級，控制著實行自治的殖民地，用機槍迫使殖民地接受它的意志。在印度充滿剝削和奴役現象，我們為此而深深悲痛」。湯姆曼接著呼籲：「我們除了要把自己的全部精力用於解放英國工人的事業上，我們還要大聲疾呼，我們也要爭取其他被奴役的各國人民獲得解放。狹隘的民族主義運動從來不會成為強大的運動，以戰勝世界到處存在的財閥。因此，我們極其希望根據健康的革命原則來協助每個被奴役的民族開展工人運動，以便隨後按照現有的各個民族的特點，各地都能獨自地開展工人運動，使之成為世界革命的一個組成部分。」<sup>31</sup> 湯姆曼對中國的初步看法，則是直接套用英帝國主義侵略印度的框架。湯姆曼的傳記作者懷特（Joseph White）指出，在這趟中國行之前，湯姆曼對中國問題的知識「最多就是基礎水平（rudimentary at best）」。<sup>32</sup> 儘管如此，湯姆曼受共產國際委託，加上自身在澳洲等地輸出革命的經歷，對這趟中國行自然熱情十足。這份熱情可見於湯姆曼在1927年2月7日從海參崴寄給一起領導1889年倫敦碼頭罷工的戰友約翰伯恩斯（John Burns）的信中：

從這封信的地址，你會看到我已遠離倫敦。經過華沙和莫斯科，我已經旅行了七千英里，其中六千英里是雪地。我正在去中國幫助他們鬥爭的路途上。他們勇敢與決心的輝煌體現，是發生在我們生命中最大的一件事，我認為我們應該與他們站在一起。<sup>33</sup>

代表團本計劃從海參崴直達前往上海，但「恐途中生障礙，俄國交通機關不敢保送」，故直接前往廣州。一行人於2月17日抵達廣州黃埔，同行除了譚平山，還

<sup>31</sup> 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文獻編輯委員會編譯，《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文件》，第2冊（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8年），頁892-893。

<sup>32</sup> Joseph White, *Tom Mann*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209.

<sup>33</sup> Chushichi Tsuzuki, *Tom Mann, 1856-1941: The Challenges of Labour*, p. 224.

有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生43人，然而在到港前，在虎門「因水淺逗留一天，又因沒有密碼不能電知，直至水漲始駛至黃埔登陸」。國民黨廣東省黨部立即決議，除了張羅招待代表團的費用外，又指示「幫助代表團搜集材料，由宣傳部負責，通函各團體擔任」。<sup>34</sup> 搜集材料的規範，可見於《國際工人代表團搜集材料條例》：

- 一、在搜集材料種類表上所列各項，均須敘述具體事實，少加議論。
- 二、所敘述之事實，必萬分真確，不可稍有虛偽，敘述尤宜明哲。
- 三、如說明某種問題，例如（八）項中之「對外方針」比較抽象，然亦必盡量列舉事實作證明。
- 四、所敘事實，有時須是現存的、而且注重瑣細，例如（一）中之（二）項，不在說明歷史，而在把如上海某外人花園掛有狗與支那人不得入內牌子，係根據某年某項條約而來這些情形說明出來。
- 五、事實須十分具體，例如說工人生活很苦，不在用許多形容句子，而在分門舉出物價指數、與工資指數、工廠待遇、工人家庭生活種種事實。
- 六、所敘事實，除（二）中之（八）、（九）外，均以廣東為範圍，不以全國為範圍，但能說及廣西雲南福建者很好。
- 七、凡每次運動、或每次紀念底傳單標語畫報，均請搜集，連同其他材料寄來，至於照片則尤為歡迎。<sup>35</sup>

現今藏於華威大學的湯姆曼檔案中，並未見到從中國帶回的相關材料，湯姆曼與白勞德出版的小冊中，亦未列入相關文件的照片，故這些材料極可能在代表團考察行程結束後，統一交給共產國際。儘管名義上代表團的行程安排由國民黨廣東省黨部負責，但實際上是由中華全國總工會委員長蘇兆徵主導。據湯姆曼事後回憶，「第一次在廣州上岸，遇見中國革命最勇敢的，就是蘇兆徵同志」。<sup>36</sup> 阿基莫娃在回憶錄中記述代表團主要行程為參訪中華全國總工會、省港罷工委員

<sup>34</sup> 〈國際工人代表團抵粵情形〉，《廣州民國日報》，廣州，1927年2月19日，版5。

<sup>35</sup> 〈國際工人代表團搜集各種材料〉，《廣州民國日報》，廣州，1927年2月23日，版5。

<sup>36</sup> 「二屆中央國府歡宴魯依及國際工人代表及反殖民地侵略大會紀錄」（1927年4月8日-28日），《會議紀錄》，國民黨黨史館藏，典藏號：會2.4/50。

會與黃埔軍校，「出席觀看了糾察隊的檢閱式、城內工人自衛軍的演習和童子團的軍事訓練」，並「向廖仲愷墓和七十二烈士墓的主紀念碑獻了花圈」，與《廣州民國日報》的記載相符。<sup>37</sup>

隨著北伐軍在1926年10月攻克武漢，廣州國民政府於1927年1月1日公告遷都武漢，故代表團到訪時，廣東的實權掌握在省政府主席李濟深手中。19日下午，國民黨廣東省黨部大禮堂設宴歡迎代表團，曾養甫為主席，甘乃光、李濟深分別致歡迎詞，報紙形容湯姆曼「年已七十餘而精神奕奕，為英金屬職工會之中堅，演說態度異常昂激，鼓掌之聲不絕」。<sup>38</sup>《廣州民國日報》與《廣州英文日報》（*Canton Gazette*）節錄的湯姆曼演講內容有些微落差，如《廣州英文日報》稱湯姆曼發言「比其他任何國家，英國的帝國主義海盜填滿了歷史的許多血腥篇章，鎮壓了數億殖民地人民」。同樣段落在《廣州民國日報》中則譯為「兄弟相信世界上着染被壓迫民眾的血跡，最利害的要算是英帝國主義」。《廣州英文日報》又節錄內容如下：

他說，中國英勇抗擊帝國主義的鬥爭將喚醒印度、南非和埃及數以千萬計的人民。對在中國的英帝國主義的每一次打擊，都不僅是中國人民的勝利，也是倫敦、格拉斯哥和曼徹斯特的工人的勝利。每當英國強盜在中國失去一個所謂的租界時，大不列顛的革命工人都會感到高興，因為這意味著對他們的敵人——同一個敵人——又是另一次打擊。<sup>39</sup>

如此極富煽動性的演講，卻不見於《廣州民國日報》中，或有兩個原因可以解釋：一是現場口譯人員未能全文照翻，僅翻譯大致內容，故《民國日報》只刊出中文翻譯內容，但臺下確有《廣州英文日報》記者以英文全文速記；二是現場口譯人員照實翻譯，但《廣州民國日報》為了節省篇幅，未刊登全文。然而考量湯姆曼演講的煽動性，我們很難想像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主管下的《廣州民國日

<sup>37</sup> 維什尼亞科娃·阿基莫娃著，王馳譯，《中國大革命見聞1925-1927：蘇聯駐華顧問團譯員的回憶》，頁250。

<sup>38</sup> 〈省黨部省政府歡宴國際工人代表團之盛況〉，《廣州民國日報》，廣州，1927年2月21日，版4。

<sup>39</sup> “H.B.M. Consulate General, Canton to His Majesty’s Minister, Peking,” 4 March 1927, FO371/12487.



報》，若能掌握湯姆曼這段演講的中文翻譯卻不予刊登的任何理由，演講現場口譯人員礙於對英國知識不足、故無法全文翻譯，應是最合理的解釋。更不尋常的是，大會介紹湯姆曼為「英金屬職工會之中堅」，然而湯姆曼在英國並無金屬工會的頭銜，現有史料似無法解釋為何會出現如此翻譯落差，據筆者推測，極可能是翻譯人員將湯姆曼全國少數派運動中（National Minority Movement）中的「少數」（Minority）誤聽為「金屬」（Metal），故發生此等誤譯。

20日，代表團出席農工商學聯合會招待會，湯姆曼發言：「帝國主義者有英法日等多個，其最殘酷者則係鄙人之祖家，各位須明白認識，鄙人係一個特別英人，亦係同受英帝國主義所壓迫者……我們預算此次回去，即用我們名義發表宣言，聯合革命民眾起而革命，務使達到英帝國主義者絕無兵士存在中國、施行種種侵略，首先推倒最殘酷之帝國主義英政府，使敵國人士與貴國人士得到和平幸福。」<sup>40</sup> 同日，代表團致電英國、法國、美國工人團體，呼籲反對英國派兵登陸上海，因其中部隊多數來自印度，故代表團特別致電印度國民會議（Indian National Congress）、印度職工會（Indian Trade Union Congress），要求撤回前往上海的印度軍隊。<sup>41</sup> 該電報英文全文於2月25日登載在《廣州英文日報》上，但從英國駐廣州領事館的報告可見，英方並未對此表達憂慮。

21日，湯姆曼寫信給妻子：「現在是早上八點十五分，我準備出發去黃埔軍校……我們每個小時都排滿了行程。」<sup>42</sup> 在當天的演說中，湯姆曼帶頭以中文歌唱〈國民革命歌〉，據多里略的報告，湯姆曼「釋放了一場難以忘懷的表演：跺腳、哭泣、振臂、高拋帽子，接著唱國際歌，又唱一遍『打倒列強』，群眾接連不斷的鼓掌，這個場景是我們在歐洲不常見到的」。<sup>43</sup> 《廣州民國日報》有如下報導：

<sup>40</sup> 〈農工商學聯合會招待國際工人代表團情形〉，《廣州民國日報》，廣州，1927年2月22日，版5。

<sup>41</sup> 〈國際工人代表團發出之要電〉，《廣州民國日報》，廣州，1927年2月23日，版3。1927年1月17日，英國內閣批准調派一個師的兵力到上海，分別從本土、印度、地中海各派一個旅前往，2月11日後陸續抵達，見呂芳上，〈北伐時期英國增兵上海與對華外交的演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7期（1997年6月），頁206。

<sup>42</sup> Tom Mann to his wife Elsie, 21 Feb 1927, MSS.334/3/2/38/1-2.

<sup>43</sup> Chushichi Tsuzuki, *Tom Mann, 1856-1941: The Challenges of Labour*, p. 226.

……英代表湯姆並登臺演說，略謂我今天得參加你們總理的紀念周，是非常榮幸的，我希望你們不僅是紀念你們的總理就算完了，最重要的是能實行你們總理的主義和教訓云云，代表演說畢，仍全體偕赴會客廳會餐，酒半酣，方教育長鼎英及各代表互起立致詞，並高呼各種口號，就中英代表湯姆且引吭用華語唱國民革命歌，尤為使人興奮……。<sup>44</sup>

22日，代表團參訪省港罷工委員會，觀摩工人糾察隊的檢閱式，《廣州民國日報》描述：「……隨請英國代表湯姆及美國代表白勞德演說，及後有童子團一人（約九歲）致答辭，時已四時許……。」<sup>45</sup> 湯姆曼的傳記則提及，1名10歲男童代表糾察隊致歡迎詞，湯姆曼聽後感動落淚。<sup>46</sup> 湯姆曼的反應，或許與其在煤礦坑中擔任童工之經歷有關，湯姆曼更在《我在中國之所見》一書中記述道：「糾察隊不僅能夠保護自己，還能照顧那些英勇而高效地戰鬥的戰友，展示了中國工人的勇氣和能力，使他們的對手不得不尊重他們。」<sup>47</sup> 23日，代表團在中山大學操場參加廣東各界歡迎國際工人代表團大會。<sup>48</sup> 24日，代表團前往黃花崗、紅花崗、廖仲愷墓致祭，湯姆曼、白勞德、多里略分別向沙基慘案死難者、七十二烈士、廖仲愷致哀。<sup>49</sup> 當日下午，一行人赴總政治部宴會。<sup>50</sup> 英方報告稱湯姆曼在總政治部的宴會上，「訴說英國工人偉大的階級鬥爭中英國軍隊扮演的恥辱性角色（shameful role）」，並表示希望英國工人階級能儘速建立自己的革命軍隊。<sup>51</sup>

25日，代表團出席抗議英國軍隊登陸上海的集會，湯姆曼稱其為在廣州參加規模最大的一場活動，共有超過4萬人參加。<sup>52</sup> 28日，李濟深在總司令部宴請代表

<sup>44</sup> 〈國際工人代表團參觀黃埔軍校〉，《廣州民國日報》，廣州，1927年2月23日，版4。

<sup>45</sup> 〈國際工人代表團參觀罷工糾察隊工人自衛隊勞働童子團盛況〉，《廣州民國日報》，廣州，1927年2月23日，版9。

<sup>46</sup> Chushichi Tsuzuki, *Tom Mann, 1856-1941: The Challenges of Labour*, p. 226.

<sup>47</sup> Tom Mann, *What I Saw in China*, p. 5.

<sup>48</sup> 〈各界歡迎國際工人代表團大會之熱烈〉，《廣州民國日報》，廣州，1927年2月25日，版3。

<sup>49</sup> Tom Mann, *What I Saw in China* (London: The National Minority Movement, 1927), pp. 6-7.

<sup>50</sup> 〈國際工人代表團致祭先烈〉，《廣州民國日報》，廣州，1927年2月25日，版5；〈總政治部歡識國際工人代表團〉，《廣州民國日報》，廣州，1927年2月26日，版5。

<sup>51</sup> "H.B.M. Consulate General, Canton to His Majesty's Minister, Peking," 4 March 1927, FO371/12487.

<sup>52</sup> Tom Mann, *What I Saw in China*, p. 6.

團成員，為表重視甚至親自「引導參觀孫總理原日之寢室及辦公廳」。<sup>53</sup> 據代表團成員斯托勒的報告，李濟深表示：「國民政府絕不會違背工人階級的利益。」<sup>54</sup> 湯姆曼在隔日給妻子的信中，提及李濟深在談話中表示，首要目標為驅逐帝國主義，並且實現中國的國民革命。湯姆曼在這封信中總結了在廣州的忙碌行程：

從抵達廣州起，我（如同其他代表團成員）的所有時間都被佔滿，如果一天有兩倍時間長，他們仍然會排滿我們的行程。現在是下午兩點半，今早我們在攝影工會有場活動，我收到了一束花，所以我順帶寄幾片樹葉給你。革命很顯然在各處發生……我們這裡一切順利。<sup>55</sup>

在廣州，湯姆曼滿懷熱忱地了解中國事物，在其訪問中國時使用的速記本中，記述了關於1842年條約、中國人口、內蒙古、外蒙古、馮玉祥和唐生智的概況，以及中國錢幣的換算方式。湯姆曼同樣熱衷於學習俄語與中文的日常用語，經常以英文拼出中、俄文日常用語的唸法。<sup>56</sup> 儘管如此，英國政府仍不敢輕視湯姆曼的潛在威脅，湯姆曼到訪廣州後，一名記者詢問英國共產黨書記英克平（Albert Inkpin）：「是誰派湯姆曼去中國？」英克平說是英國共產黨，並出示英國共產黨政治局通過的宣言「殺害組織上海罷工的二十位工會人物的責任全部落在鮑德溫帝國主義政府頭上」，並呼籲推翻鮑德溫（Stanley Baldwin）政府，以免中國工人的遭遇發生在英國工人身上。該名記者為瞭解湯姆曼究竟多大程度代表英國工人的立場，故接連訪問英國工會大會（Trades Union Congress）、英國工黨與英國獨立工黨，三者皆否認知悉湯姆曼的中國行，並表示湯姆曼不代表他們的立場。<sup>57</sup>

3月6日，代表團結束在廣州16天的行程，啟程前往武漢，當日歡送大會共有萬餘人參加，湯姆曼演說表示：「希望你們努力奮鬥到底，祝你們國民革命不日

<sup>53</sup> 〈總司令部歡譙國際工人代表團〉，《廣州民國日報》，廣州，1927年3月2日，版4。

<sup>54</sup> Harold R. Isaacs, *The Traged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p. 109.

<sup>55</sup> "Tom Mann to his wife Elsie," 1 March 1927, MSS. 334/3/2/39.

<sup>56</sup> "Visit to China, via USSR," 1927, MSS 334.8/2-3.

<sup>57</sup> "Tom Mann at Canton," 23 February 1927, *The Daily Telegraph*, 12.

成功，更希望你們不忘記西方無產階級是你們的好朋友」。<sup>58</sup> 據湯姆曼回憶，在廣州代表團一共在30場聚會上演講，其中一半是大型群眾聚會。<sup>59</sup> 蔣介石於4月12日發動清黨後，15日李濟深隨即在廣東跟進反共。<sup>60</sup> 5月10日在廣州的一場會議上，總政治部代理宣傳科長賴連向英國駐廣州和香港記者解釋國民黨「清黨」原因，並回答記者問題，路透社記者問：「廣東政府對湯姆曼的態度為何？」賴連答道：「我們並未特別重視他。」<sup>61</sup> 然賴連的回答顯與事實不符，因若無李濟深的支持，代表團無法在廣州期間得到盛大歡迎。

代表團離開廣州後，並未選擇坐火車直達武漢，而是坐船與徒步穿過中國鄉村，順帶考察中國農民生活，如湯姆曼在報告中寫道：「穿過多山的和典型的農村鄉下、稻田和麥田、種茶區域。」<sup>62</sup> 代表團在江西的旅途充滿艱辛，如湯姆曼在給妻子的信中記述：「我們讓苦力背負所有行李和轎子，當我疲倦的時候，我就在椅子上休息，但我自己爬上山頂，並走下非常峭的山路，直到走到比較平坦的地方後，我才重回到椅子的懷抱。」<sup>63</sup> 相較於在廣州受到的熱情歡迎和禮遇，代表團甫抵江西，即親身體驗中國工人運動觸目驚心的場景——贛州總工會委員長陳贊賢於3月6日遭國民革命軍第一師黨代表倪弼槍決。<sup>64</sup> 事件發生後，國民黨左派與中共領導的群眾團體，多次致函國民黨中央要求嚴懲倪弼。<sup>65</sup> 由於倪弼為

<sup>58</sup> 〈廣州各界團體歡送國際工人代表團北上盛況〉，《廣州民國日報》，廣州，1927年3月7日，版5。

<sup>59</sup> Tom Mann, *What I Saw in China*, p. 5.

<sup>60</sup> Arif Dirlik, "Narrativizing Revolution: The Guangzhou Uprising (11-13 December 1927) in Workers' Perspective," *Modern China*, 23:4 (October 1997), pp. 374-375.

<sup>61</sup> "Acting Consul-General Brenan to Sir Austen Chamberlain," 12 May 1927, FO371/12407. 賴連此時應為總政治部代理宣傳科長，見〈曾濟寬辭總政治部宣傳科長、以賴連代理〉，《時報》，上海，1927年5月25日，頁3。

<sup>62</sup> Chushichi Tsuzuki, *Tom Mann, 1856-1941: The Challenges of Labour*, p. 227.

<sup>63</sup> "Tom Mann to his Wife Elsie," 20 March 1927, MSS. 334/3/2/40.

<sup>64</sup> 陳贊賢原為國民革命軍第二軍第五師政治部黨務科長，收復贛州後，以特派員名義組織贛州總工會，擾民衝突情形層出不窮，國民黨中央派員查辦未果後，倪弼下令拘捕和擊斃陳贊賢。見李雲漢，《從容共到清黨》，下冊（臺北：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委員會，1966年），頁565-568。

<sup>65</sup> 「向忠發致中執會函」（1927年3月21日），《漢口檔案》，國民黨黨史館藏，典藏號：漢10280。

蔣介石任命，中共於是利用這起事件，組織「陳贊賢慘案委員會」，從事反蔣活動。<sup>66</sup> 代表團於3月17日得到贛州「局勢非常反動」的消息後，同樣對這起事件表達強烈關注，同日，湯姆曼聯合多里略、白勞德與斯托勒，致信國民黨中央，要求由代表團參與調查該案，並請求國民黨予以配合。<sup>67</sup> 據湯姆曼回憶，代表團獲悉此消息時，代表團剛抵達江西省南安鎮，湯姆曼注意到前來接待的工會代表缺乏活力（an absence of buoyancy），得知原因後，該代表請求國際工人代表團抵達贛州後，針對此事展開調查。<sup>68</sup> 19日，代表團抵達贛州，贛州總工會已遭倪弼解散，無人出面迎接。湯姆曼向前來迎接的國民黨代表表示驚訝，「因為這是我們第一次沒有遇到所有革命組織的代表，工人和農民都不在這裡」。<sup>69</sup> 代表團在當地停留36小時，試圖訪問地方工會人士，了解事件經過。湯姆曼在20日寫給妻子的信中，記載了代表團在贛州的調查活動：

在抵達這裡之前，我們已經知道這裡的情況很不好，它們在去年九月北伐軍經過這裡後才成立。儘管國民黨成立了群眾革命委員會，卻被商人和中產階級（分別叫買辦和地主）迅速掌控，很快展露出他們對工人組織工會，或對國民黨作為一個革命團體的敵意，這導致了兩前〔按：次〕的暗殺……抵達贛州後，我們決定上岸，我簡單回應了歡迎，說我們要進行調查……我們與地方治安官和其他人回到船上進行兩小時的對話……我們詢問他們真實的困難，但對他們的回答無法感到滿意……。<sup>70</sup>

代表團的調查行動，最終也不了了之，倪弼並未受到相關懲處。代表團對地方局勢不了解，自然而然的採用了中共的說法，認為蔣介石是幕後主使者，斯托勒甚至在文章中道，陳贊賢是被「蔣介石僱人刺殺」。<sup>71</sup> 「陳贊賢事件」可謂代

<sup>66</sup> 關於陳贊賢事件的真相，國共兩黨研究始終各執一詞，國民黨方面以李雲漢《從容共到清黨》一書中的分析最為詳細，以國民黨館藏史料，證實陳贊賢有騷擾婦女、擾亂地方秩序之行為，故倪弼槍決陳贊賢之舉，實為伸張正義。中共方面，則稱蔣介石製造贛州慘案，見黃修榮，《國共關係史》，上卷，頁676。

<sup>67</sup> Sydor Stoler, "Reaction in Kiangsi," *Chinese Correspondence*, 2:8 (May 1927), pp. 14-17.

<sup>68</sup> Tom Mann, *What I Saw in China*, p. 9.

<sup>69</sup> Tom Mann, *What I Saw in China*, p. 10.

<sup>70</sup> "Tom Mann to his wife Elsie," 20 March 1927, MSS. 334/3/2/40.

<sup>71</sup> Sydor Stoler, "A Visit To Hunan Province," *Pan-Pacific Worker*, 2 (July 1927), p. 19.



表團在中國考察行程的轉折點，當代表團抵達廣州時，蔣介石已在南昌另立中央，與武漢分庭抗禮，但雙方並未正式決裂，故代表團仍對蔣介石抱有好感，甚至向蔣介石致意並獲得回覆。<sup>72</sup> 經歷這次事件後，代表團開始懷疑蔣介石對革命的態度，25日，代表團抵達南昌，隔日專程參觀蔣介石在南昌的總司令部，並出席當晚以蔣介石名義舉辦的晚宴。然而，蔣介石本人於當天趕赴上海，並未與代表成員見面。據白勞德回憶，一位喝醉酒的中產階級軍官告訴他們，「中國需要一個強人，而這名強人就是蔣介石」。<sup>73</sup> 至此，代表團對蔣介石的好感急轉直下，開始視蔣介石為「反革命」，對武漢中央自然抱有更強烈的好感。代表團在九江短暫停留，考察中國收回英租界的進展，湯姆曼稱其為第一次踏上前租借地（*ex-concession*），因而對九江英租界的前後變化感到興趣。<sup>74</sup> 29日，在江西的任務結束，代表團啟程前往南昌，乘坐武漢中央派遣的「專輪」前往武漢。<sup>75</sup>

代表團在江西目睹的情景讓他們對蔣介石的好感急劇下跌，然而仍有不明所以的人認為，湯姆曼一行人目睹的一切都是被刻意安排好的，如一位英國人寫道：

湯姆曼恐怕會有完全不同的看法，但他看到的只是他所願意看到的。他從廣州到廣西的陸路旅程中，途中不斷停留在村莊。農民和農民協會紛紛出來迎接他，並讚揚新條件的優點。他沒有看到黑暗的背景，而且他看到的是在新奇的熱情還沒有消退的時候。我不否認，中國許多村莊的經濟狀況對地主非常有利，像其他國家的許多同類一樣，中國的地主也考慮自己的利益。一個剛剛擺脫了令人討厭的租金和資本主義壓迫控制的村莊必然會充滿喜悅，對於像湯姆·曼這樣性格的人來說，身穿節日服裝的農民們充滿烏托邦的喜悅會讓他聯想到新耶路撒冷仿佛從天上降臨。<sup>76</sup>

<sup>72</sup> Chushichi Tsuzuki, *Tom Mann, 1856-1941: The Challenges of Labour*, p. 227. 據代表團成員白勞德回憶，蔣介石於3月18日在九江復函歡迎代表團訪問。見 Earl Browder, *Civil War in Nationalist China* (Chicago: Labor Unity Publishing Association, 1927), p. 13.

<sup>73</sup> Earl Browder, *Civil War in Nationalist China*, pp. 21-22.

<sup>74</sup> Tom Mann, *What I Saw in China*, p. 16.

<sup>75</sup> 「鮑慧僧致中央黨部電」（1927年3月29日），《漢口檔案》，典藏號：漢16483。

<sup>76</sup> “Hardy Jowett to Fred,” 20 December 1927, FO371/13165.

## 肆、武漢與中共五大

代表團在3月30日抵達武漢，此時武漢正處於革命運動的高潮，首先是1月4日中國群眾衝入英租界，英國選擇和平應對，導致國民政府收回漢口英租界的外交勝利；其二是國民黨召開二屆三中全會，限縮蔣介石的政治和軍事大權，譚平山與蘇兆徵分別擔任國民政府農業部長與勞工部長。對國民黨武漢中央而言，沒有人曉得這3名代表是何方神聖，只知道是著名的工人運動領袖，如同4月1日下午鮑羅廷在國民黨會議上提出招待代表團時的簡介：「一個是美國人，職工教育委員會的；一個是英國人，出名的工人；一個是法國人，議員。」<sup>77</sup> 然而就鮑羅廷而言，其曾在1922年被共產國際派赴英國，化名喬治布朗（George Brown）指導英國共產黨工作，不久遭到逮捕，故湯姆曼與鮑羅廷極可能在當時相識。<sup>78</sup>

代表團的到訪，對此刻的國民黨有著重大的政治意義。3月10日，武漢中央在漢口召開二屆三中全會，正式與蔣介石劃清界限。16日，又發布二屆三中全會宣言，將反英運動列為核心政策，並寫道：「英國的和其他各國的被壓迫的民眾，還是對中國革命表同情的。雖然也有些反動派、投機派的領袖，譏言鼓惑，貶損中國革命的價值，卻是各國被壓迫民族與勞苦民眾已漸漸的了解中國革命的真象了。」<sup>79</sup> 在此情勢下，湯姆曼這名英國「出名的工人」的到訪，無疑可代表英國「被壓迫民眾」現身說法，鼓舞武漢軍民士氣，強化集中武漢中央與蔣介石抗衡的力量。正因為這層政治意義，武漢當局對代表團的接待工作極為隆重。30日，代表團抵達漢口，中華全國總工會及各團體代表均前往碼頭迎接。<sup>80</sup> 31日，

<sup>77</sup> 〈中國國民黨第二屆常委會第五次擴大會議歡迎國際工人代表團速記錄〉（1927年4月2日），收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國國民黨第一、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史料》，下冊，頁1013。

<sup>78</sup> Henry Pelling, "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Great Britain, 1920-9,"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8 (1958), p. 44.

<sup>79</sup> 〈中國國民黨第二屆中執會第三次全會宣言〉（1927年3月16日），收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國國民黨第一、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史料》，下冊，頁781。

<sup>80</sup>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劉少奇年譜》（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頁64。

中華全國總工會在「普海春」舉辦第一場歡迎晚宴。<sup>81</sup> 李立三在會上致歡迎詞，指出西方工人運動有百年以上歷史，處於萌芽階段的中國工人運動「應該十二萬分誠意來歡迎這種經驗」。<sup>82</sup> 4月1日，湖北總工會動員數千名工人，舉行歡迎代表團的集會，湯姆曼表示：

各位同志，我到漢口只有二十四小時有機會能走到各國租界地方去，就起了我極大的感想，在租界內面有一些地方——這些地方是中國管轄範圍以內的，中國人民生命所託一部分——只許外國人走，不准中國人走，我想這不過因為帝國主義的兵船多些，槍炮利害些，動不動就用暴力來壓迫中國，禁止中國人在中國領土以內的地方走路。中國人就甘心如此嗎？設若我是中國人我一定拚我的頭顱用我的全力來和英帝國主義者血肉相搏，不是他打死我，我便應該殺死他。<sup>83</sup>

湯姆曼事後回憶，在武漢一場活動平均歷時3個半小時，其中翻譯代表團的講詞就占據大量時間，因為「翻譯總是希望非常準確，自然需要與我們自己翻譯一樣長的時間」。<sup>84</sup> 湯姆曼延續兩年前在英國發起「不干涉中國」運動的論點，將中國反抗英帝國主義與英國勞工反抗資本主義劃上等號，因此中國反帝運動的勝利就是英國工人的勝利。同日，國民黨中執會致信代表團，邀請代表團出席隔日舉行的中常會擴大會議，可見對代表團的極高禮遇和重視。<sup>85</sup> 2日，在國民黨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委會第五次擴大會議上，代表團應邀出席發言，湯姆曼因病未能與會，徐謙、何香凝、多理略與白勞德分別發表演說。<sup>86</sup>

<sup>81</sup> 「中華全國總工會致中執會函」（1927年3月30日），《漢口檔案》，典藏號：漢4276。

<sup>82</sup> 〈全國總工會昨在普海春歡宴國際職工代表團全國總工會蘇委員長之熱烈情形〉，《漢口民國日報》，漢口，1927年4月1日，第3張新聞第1頁。

<sup>83</sup> 〈全國總工會歡迎國際工人代表團席上 各代表重要演說詞〉，《漢口民國日報》，漢口，1927年4月2日，版10。

<sup>84</sup> Tom Mann, *What I Saw in China*, p. 18.

<sup>85</sup> 「中執會致國際工人代表團函稿」（1927年4月1日），《漢口檔案》，典藏號：漢17905。

<sup>86</sup> 〈中國國民黨中執會第二屆常委會第五次擴大會議歡迎國際工人代表團速記錄〉（1927年4月2日），收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國國民黨第一、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史料》，下冊，頁916-923。代表團獲邀出席國民黨中執會常委會會議並發言，足見其受到極高禮遇，5月6日日本勞工代表團同樣獲邀列席國民黨常委會，但未在會上發言，見前書頁945。



白勞德在會上解釋，因湯姆曼生病，「大家勸他在旅館休息預備回國工作，所以沒有到會。但他說在他離開武漢之前，必定要和此地的革命朋友見一回面才走的」。<sup>87</sup> 譚延闓亦在同日日記中記載「英人湯姆曼以病未至」。<sup>88</sup> 同日，湯姆曼發布〈致全世界工人與農民團體信〉，其中提及：「在過去的兩個月中，我們的代表團訪問了數百名工人、農民、商人、學生和婦女組織，以及中國南部和中部的國民軍和國民黨，到處都受到了最熱烈的歡迎。我們直接會見並交談了數十萬中國人，他們英勇地為國家解放而戰，並尋求與世界工人階級建立有效的聯盟……。」<sup>89</sup>

代表團獲邀參加國民黨中常會擴大會議，又進一步升級了代表團的歡迎規格，同日「武漢各界歡迎國際工人代表團暨全國總工會委員長大會」甚至發出「緊急通告」給各團體，「務希按時整列參加」隔日在漢口濟生三馬路舉行的歡迎大會。<sup>90</sup> 歡迎代表團的宴會蜂擁而至，甚至因為邀約過於繁多，出現「檔期衝突」的情況，如國民黨湖北省黨部與漢口特別市黨部致信中執會，告知本已計劃在3日宴請代表團，但因與中執會的宴請衝突，只得改到4日。<sup>91</sup> 3日，武漢各界團體在漢口濟生三馬路舉行歡迎代表團大會，共有50萬人參加。湯姆曼在歡迎大會上發表演說，提及「兄弟是從英國來，我知道英政府就是壓迫你們中國最利害最殘忍的一個，但是你們還要知道英國裏工人他們十分了解你們反帝國主義的革命運動，並且要竭力幫助你們……當你們高呼『收回租界，收回你們的主權』的時候，英國工人階級一定給你們同情和影響的」。<sup>92</sup> 在當晚國民政府的晚宴上，

<sup>87</sup> 〈中國國民黨中執會第二屆常委會第五次擴大會議歡迎國際工人代表團速記錄〉（1927年4月2日），收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國國民黨第一、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史料》，下冊，頁922。

<sup>88</sup> 譚延闓，《譚延闓日記》（北京：中華書局，2019年），頁238。

<sup>89</sup> “Activities of International Labour Delegation in China,” 26 April 1927, FO371/12487.

<sup>90</sup> 「歡迎國際工人代表團等大會上中執會函」（1927年4月2日），《漢口檔案》，典藏號：漢6097。同日，「武漢各界歡迎國際工人代表團暨全國總工會委員長大會」致信國民黨中執會請「特派代表到會訓詞」。見「歡迎國際工人代表團等大會上中執會函」（1927年4月2日），《漢口檔案》，典藏號：漢6096。

<sup>91</sup> 「湖北省黨部等上中會呈」（1927年4月2日），《漢口檔案》，典藏號：漢17050.1。

<sup>92</sup> 〈武漢各界昨日舉行歡迎國際工人代表團 全國總工會蘇委員長大會之熱烈情形〉，《民國日報》，漢口，1927年4月4日，第3張新聞第1頁。

湯姆曼再度發表演說，首先介紹英國工人運動情況，接著談及英國的工人運動如何能給中國革命帶來幫助：

現在大家很希望知道英國工人，在任何地方與時間，來幫助中國革命成功。英國不但能幫助中國，並且剛才所說得少數（一百萬工人）分子，在「工會」在「合作社」做工作，這一百萬工人們，個個知道，個個覺悟，自早至晚，時時奮鬥，不感危險，不怕政府，不怕政府的子彈，只知奮鬥，這一百萬工人曉得帝國主義，就是資本主義，壓迫我們的資本主義，就是壓迫你們的帝國主義。（鼓掌）……壓迫我們，壓迫你們，在印度，在非洲，在中國，在坎拿大，資本主義的壓迫，這一百萬工人，都是曉得的，各地被壓迫民族都起來了，尤其是看見你們的奮鬥，更覺得十分歡喜！無限的同情！（鼓掌）

如果英國繼續侵略中國，機器工人，可以堅決的反對英國政府，現在是少數工人運動，同多數工人都是一致主張的。（鼓掌）我敢斷定多數工人，必可繼續主張公道，主張正義，停工、停船、停止兵工廠，來反對這種行為的。（鼓掌）現在工作是非常危險的，就是他們正在軍隊中，做有系統工作，一百萬少數運動人，是個個都覺悟、勇敢，日日在幫助中國革命，我們是窮人，是不值錢的人，雖然是要幫助中國革命，要反對英帝國主義，不是等你們請我們才來幫助，不請我們也是來幫助的。（鼓掌）因為我們的革命，就是幫助中國革命，幫助中國革命，就是擁護世界革命。（鼓掌）<sup>93</sup>

白勞德接著發表演說，一如湯姆曼介紹英國工人對中國革命的同情，白勞德提及中南美洲組織「反對英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委員會，來援助中國革命」並抨擊美帝國主義的門羅政策與門戶開放政策，指出美國工人「是贊成中國革命，而十分同情中國革命的」。多里略則回溯法帝國主義自法國大革命開始，壓迫本國無產階級，「養成強健力量，然後開始侵略殖民地」，故中國與法國工人都是帝國主義受害者，因此「無產階級與工人向本國資本主義進攻，就是真正的幫助中國革命」。

<sup>93</sup> 「二屆中央國府歡宴國際工人代表團紀錄」（未載明時間），《會議紀錄》，典藏號：會2.4/49。

3位代表的演說，充滿了濃厚的理想主義色彩，然而在現實中，皆與中國情況相去甚遠。這種認知，可見於譚延闓當天的日記：「湯姆者，英工人也，演說甚久，窮形盡相，法、美二人繼之，季龍、蘇兆徵又繼之，散已十一時半。」<sup>94</sup> 譚延闓以「窮形盡相」4字形容湯姆曼，顯然貶抑成分居多。然而，不論國民黨左派要人是否與譚延闓持有同樣感想，3位重量級代表的演說，恰恰滿足了當時武漢政府的政治需要。與此同時，在歡迎會當日，漢口發生四三事件，群眾與日租界士兵發生武裝衝突，排外情緒高漲。代表團的出現，更為武漢政府的反帝運動注入一劑強心針，如徐謙在歡迎會上說道：

今天得到英美法同志來援助我們，將英美法帝國主義的陰謀，和盤托出，如非革命者，必定要替本國辯護的，何肯把帝國主義罪狀盡量暴露，可見工人無國界，有世界性的。我們對外應打倒帝國主義，同時對內，也要肅清與帝國主義勾結的反動派。

四三事件的爆發又令英國駐漢口領事大為緊張，在報告中稱：「不幸的是在此時刻惡名昭彰的外國共產黨代表團應該要正式拜訪武漢國民政府。」<sup>95</sup> 如各方所料，正因代表團可起到「反帝」與「反蔣」的雙重鼓舞作用，在武漢的各類群眾團體的邀請函蜂擁而至，爭先要求代表團參加群眾集會、發表演說。4月4日國民黨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開學典禮，湯姆曼致詞略謂：「中國無產階級對革命要負重大責任，你們畢業後到農間去，不僅中國農民與你們表同情，全世界無產階級也要表同情，你們將來一定要遇著仇敵，切不可灰心……。」<sup>96</sup> 該場合為毛澤東和湯姆曼首次見面，唯兩人似無過多交集。4月5日《漢口民國日報》刊出〈各團體招待國際工人代表團日程〉一文，代表團的行程已排到19號，其中不乏一日參加兩場歡迎大會的情形。<sup>97</sup> 由於邀約過於踴躍，檔期衝突情形仍一再上演，中華全國

<sup>94</sup> 譚延闓，《譚延闓日記》，頁241-242。

<sup>95</sup> “Mr. Teichman to Sir M. Lampson,” 7 April 1927, FO371/12481.

<sup>96</sup> 〈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開學典禮盛況〉，《漢口民國日報》，漢口，1927年4月5日，第3張新聞第1頁。

<sup>97</sup> 自4月3日至19日，參與招待國際工人代表團的工人團體有店員、兵工廠、碼頭、海員、煙草、紗廠、車夫、印務、京漢鐵路、粵漢鐵路、五金總工會等，另外尚有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婦女協會、商民協會、中華學生總會發出歡迎要求，幾乎包含

總工會甚至為此在報紙上刊登啟事，要求各團體向總工會接待處接洽。武漢群眾的熱情，使代表團成員一掃在江西的不愉快記憶，如斯托勒所言，只有抵達武漢後，代表們才得以「再次自由地呼吸」。<sup>98</sup> 事實證明，武漢各界群眾團體對代表團的歡迎，遠超國民黨武漢中央事前的評估，「歡迎情形熱烈達於沸點以上」。

國民黨武漢中央領袖人物，亦時常受各類群眾團體邀請，參加歡迎代表團的大會，如4月15日，國民黨中執會婦女部致信中執會，轉達各界邀約：「本月十七日正午十二時，武漢各界婦女在血花世界開會歡迎國際工人代表團、全國總工會蘇委員長暨第三國際代表，屆時請蒞臨指導。」<sup>99</sup> 再如4月6日，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武漢分校致信譚延闓、徐謙、鄧演達、顧孟餘、惲代英等5位委員，「本校訂於四月八日上午九時開歡迎國際工人代表團、第三國際代表、印度代表及本國工農領袖大會，屆時擬請五委員為歡迎會主席團」。<sup>100</sup> 各類歡迎大會上，經常由譚延闓與徐謙輪流擔任主席，而湯姆曼的發言，往往較其他兩位來得冗長，又因其代表英國，故令人印象最深，如4月8日《譚延闓日記》記載：「今日歡迎國際工人代表也，余為主席，登兩重桌而演說，孟瀟繼之，英代表湯姆曼又繼之，已十二時，乃與程、唐先出。」<sup>101</sup> 代表團在武漢的頻繁活動，確實符合徐謙的評估，鼓舞了武漢群眾士氣。為表達對代表團的謝意，國民黨中執會於4月8日致函代表團：「惠臨敝國熱烈的指導我們的革命策略和方法，使我們革命群眾增加了濃厚的興味，鼓舞了百倍的勇氣，知道我們革命民眾有國際革命團體的幫助……無論何時願與我國際革命工人團體聯合戰線共同奮鬥。」<sup>102</sup>

湯姆曼一行人抵達武漢兩周後，蔣介石於4月12日在上海發動清黨，再度引發國際工人代表團的抗議。13日，代表團與羅易聯名致信蔣介石，指其違反汪

---

各性質之群眾組織。見〈招待國際工人代表團日程〉，《漢口民國日報》，漢口，1927年4月5日，第3張新聞第1頁。

<sup>98</sup> S.Stoler, "A Visit to Hunan Province," *Pan-Pacific Worker*, 2 (July 1927), p. 19.

<sup>99</sup> 「歡迎國際工人代表團上中執會函」（1927年4月15日），《漢口檔案》，典藏號：漢6578。

<sup>100</sup> 「歡迎國際工人代表團等會籌備處致譚組庵等函」（1927年4月6日），《漢口檔案》，典藏號：漢6577。

<sup>101</sup> 譚延闓，《譚延闓日記》，頁250。

<sup>102</sup> 「中執會致國際工人代表團電稿」（1927年4月8日），《漢口檔案》，典藏號：漢17906。

精衛的協議，建議蔣介石停止分裂國民黨，並表示如聽從建議，代表團願啟程赴南京拜訪。<sup>103</sup> 代表團此時仍認為蔣介石有回心轉意的可能，甚至不無天真的認為，蔣介石可能對代表團前往拜訪表示重視，殊不知蔣介石「清共」心意已決，無暇理會代表團的來信。事實上，自贛州「陳贊賢事件」後，代表團已對蔣介石失去信心，但仍抱有一絲希望，此次上海清黨事件，則使代表團最後的希望徹底破滅。代表團的最初任務，重點為鼓舞中國反對帝國主義，對革命團體內部分裂事始料未及，眼見國共分家無法挽回，代表團只得留在武漢，繼續執行任務。湯姆曼與國際工人代表團在漢口花費4周時間，參與各路群眾團體的歡迎大會，不斷重複幾近相同的演說內容；惟在上海「四一二」事件後，在演講中強化了對蔣介石的攻擊。

19日，武漢國民政府再次誓師北伐，當天代表團啟程前往湖南考察。鮑惠僧與林祖涵特別將此消息知會湖南的工農團體。<sup>104</sup> 21日中共湖南區執行委員會發布〈歡迎國際工人代表團〉一文，除了延續先前反對帝國主義武力干涉中國的論調，又加入了反對蔣介石的論述：

……帝國主義之干涉中國，除開砲艦刀槍之外，還有種種的陰謀，攻擊反動軍閥以武器或金錢，勾引中國資產階級以小恩小惠，固然是五卅以來不斷使用的政策，尤其是近來幾月，更進一步而聯絡中國國民黨中的妥協派蔣介石等煽動他們反對工農羣眾，拋棄他們總理孫先生聯俄聯共扶助工農的三大政策，排斥革命左派……這種分離革命勢力的政策，是

<sup>103</sup> Harold R. Isaacs, *The Traged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p. 157. 據《蔣介石日記》與《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等史料，並未記載蔣介石對這封來信的反應，事實上，究竟蔣介石是否收到這封信，亦無法定論。不論如何，自代表團於2月初抵達廣州後，蔣介石從未關注代表團的行蹤，以及其賦予的政治任務。蔣介石於4月12日寧漢分裂後致電羅易，爭取支持，並未提及與羅易一同在中國訪問的國際工人代表團，見〈蔣總司令致漢口第三國際代表路伊電〉，收入中華民國開國文獻編纂委員會、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編，《共匪禍國史料彙編》，第1冊（臺北：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編纂委員會，1964年），頁289-290。相照之下，代表對與蔣介石會面的渴望，反應了此刻共產國際對蔣介石的認知，仍停留在過去「紅色將軍」的印象中。

<sup>104</sup> 「鮑惠僧林祖涵致湖南總工會電稿」（1927年4月18日），《漢口檔案》，典藏號：漢15781.1。



比砲艦政策的干涉還要可怕。我們希望你們把這種真象普告全世界的無產階級，揭破帝國主義干涉中國之陰謀的方式。<sup>105</sup>

代表團訪問湖南時，正趕上中共領導湖南農民運動的高峰，獲邀至22日舉行的群眾大會上演說。<sup>106</sup>多年後，中共延安五老之一的謝覺哉撰文回憶在湖南親歷湯姆曼演說的場景：

不懂他的話，然而被他激動、感奮、似乎有一種東西刺入你的心坎裏，即使久了，他的聲音動作，還清楚地留在你的記憶。這在我，就只有一九二七年春，在長沙教育會坪群眾歡迎會聽到，湯姆曼同志的演說。他手舞著、跳著，激情四射著、口叫著，成千上萬的人們隨著他笑、隨著他哭，隨著他興奮，雖然並沒有聽清他說的什麼。……湯姆曼同志最關心中國革命特別是那時的統一戰線。在湖南國民黨官吏的一個宴會上，湯姆曼同志講了許多話，講英帝國的工人組織，即在袋裏拿出他的工會證章給人看。當然，並不能引起官吏們的興趣。同湯姆曼體格年齡都差不多的湖南的主席張翼鵬先生起來演說了，他說明湖南人民的組織普遍很深入，現加入了組織的有八千萬，大概錯譯，我們知道湖南人民一共只有三千萬，疑譯語有錯即轉問，但張主席回答仍是八千萬，管理全省人民的主席硬說人民且有了組織的人民是八千萬，外國人的湯姆曼同志自然無可奈何。——原來張主席演說是秘書擬稿，但張主席又不把稿看着，所以常常弄錯，我不大知道湯姆曼同志當時心是怎樣感想的。……<sup>107</sup>

代表團在湖南僅停留數日便返回武漢。26日，代表團招待處致信國民黨中執會：「國際工人代表團三日內即將先後離漢，欲得貴會委全體照相及開會時之照片四張，以便各攜回本國向其國人介紹。」<sup>108</sup>由此可知，此時代表團打算4月底離開武漢，返回歐洲，並未執行原先共產國際的建議，參加中共五大與太平洋勞

<sup>105</sup> 〈歡迎國際工人代表團〉，《戰士》，長沙，1927年4月24日，頁1-2。

<sup>106</sup> 〈敵愾同仇 長沙歡迎英美工人代表紀〉，《大公報》，天津，1927年5月11日，版6。

<sup>107</sup> 〈湯姆曼同志的一瞥〉，《新中華報》，延安，1941年4月17日，版4。

<sup>108</sup> 「國際工人代表團招待處上中教會函」（1927年4月27日），《漢口檔案》，典藏號：漢17461。

動會議。代表團提前返國的打算，與代表團對蔣介石「清黨」後中國革命前途的悲觀，不無直接關係。28日，國民黨中執會、國民政府與武漢各民眾團體舉行「歡送國際工人代表團並歡迎太平洋勞動大會日本勞工代表團」大會，會上湯姆曼發表在中國考察兩個月的感想：

各位同志！我對於中國工人情形，已得了深深的感動，感想是甚麼？就是中國工人，所得工資非常低少，中國工人一星期所得，要是向我國無產階級報告，總能不替中國數萬萬工友叫屈。各位同志，照我所說，中國工人工資應提高……提高工資，勞工部長蘇兆徵同志，一定會從現在低少工資，增加到工人享得真自由，得到最後解放的。……中國工友們工作時間，也太不平等了，很少的做八小時工作，甚至有十時，十一時，以至十二時，各位！這樣，簡直不是人類哪！（鼓掌）十時的工作，是把全身力量，都銷滅殆盡，所以我說，除工資提高以外，還要把工作時間劃一，使身體得到健全，如果再聽見資本家說，多花費些時間，多出點工資。各位同志，我們非將這個主義，打倒不可。（鼓掌）……中國還有童工，並不像西方到了一定年齡才做工，中國是十歲、九歲、八歲，甚至七歲也做工……中國的婦女，非大大的改變不可，各位同志都清楚中國婦女不用說是全世界最受壓迫的，婦女在中國，受極不平等的待遇，每日不知接受了好多不平等言語啊！要是想同男子一樣，致力革命運動，可是又被所謂禮教隔絕了我覺得女子，是應該一樣的與男子發展，而況中國有二萬萬女子占人口之半呢！<sup>109</sup>

這段演說與之前相比，最大的區別在於隻字未提反對英帝國主義，更耐人尋味的是，同樣一段演講內容，在4月29日的報紙中卻僅節錄為短短數句：「英代表湯姆曼演說，大意謂：增加工資，減少工作時間，剷除童工制度，與及婦女解放運動，都希望蘇兆徵同志努力等語。」<sup>110</sup>事實上，早在4月18日第四軍第十一軍歡迎汪精衛和國際工人代表團的大會上，所有發言悉數針對蔣介石，如汪精衛

<sup>109</sup> 「二屆中央國府歡宴魯依及國際工人代表及殖民地略大會紀錄」（1927年4月8-28日），《會議紀錄》，典藏號：會2.4/50。

<sup>110</sup> 〈歡送國際工人代表 歡迎太平洋勞工會代表〉，《漢口民國日報》，漢口，1927年4月29日，第1版新聞第2頁。

發言「現在蔣介石拿槍砲向工農打了！這個我們鐵軍是不答應他的！（臺下高呼打倒蔣介石！）」，而代表團3位人士發言均未節錄，涉及反對帝國主義之語句，僅在議決中有「猛然向帝國主義進攻，以求得一切被壓迫民眾之自由平等」一句。<sup>111</sup>

茅盾在回憶錄中寫道，《漢口民國日報》名義上是「國民黨湖北省黨部的機關報，但實際上是為共產黨工作。這是因為報紙的實權掌握在共產黨的手裏……報紙的編輯方針、宣傳內容也是由中共中央宣傳部確定的，我有問題，也是向中共中央宣傳部請示」。<sup>112</sup> 因此該報紙對宣傳尺度的管控，顯然與中共的政治需求環環相扣，之所以發生這種變化，最合理的解釋在於4月中旬鮑羅廷「戰略退卻」策略的執行。<sup>113</sup> 簡言之，因應3月24日發生的南京事件，英國政府在29日撤出武漢等地的僑民，對武漢實施經濟封鎖，4月12日蔣介石在上海發動清黨後，武漢當局的政治經濟局勢更加惡化，為挽救危局，4月15日武漢國民政府成立戰時經濟委員會，又在外交上「緩和帝國主義對武漢政府的敵視、封鎖、威脅與顛覆活動」。<sup>114</sup> 儘管湯姆曼在〈我在中國之所見〉文中並未提及4月中旬後公開演說中不激烈批評英帝國主義的原因，現存的共產國際與中共史料亦未有相關記錄，但鮑羅廷極可能私下告知國際工人代表團，要求配合執行戰略退卻策略，暫緩激烈批評帝國主義，改以批評蔣介石為主。

## 伍、中共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與泛太平洋勞動會議

代表團本計劃在4月底離開武漢，為了出席在武漢召開的中共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又將日程向後延，代表團在最後關頭決定參加中共五大，原因既可能為

<sup>111</sup> 〈第四軍第十一軍歡迎汪精衛委員暨國際工人代表團盛況〉，《漢口民國日報》，漢口，1927年4月22日，第3張新聞第1頁。

<sup>112</sup> 茅盾，《我走過的道路》（香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1年），上冊，頁281。

<sup>113</sup> 李戡，《向忠發與中國共產革命》（香港：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2019年），頁85。

<sup>114</sup> 羅重一主編，《共產國際與廣州國民政府關係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年），頁134。



代表團「回心轉意」，亦可能接獲了共產國際的指示。<sup>115</sup> 由於代表團被賦予的政治意義，4名代表獲准旁聽大會，據曾參加中共五大的鄭超麟回憶：

第一日開幕禮是在武昌第一小學舉行的，校長王覺新是同志，他穿著西裝招待來賓和眾代表。這日，我奉了使命，領國際代表團過江到武昌去，老湯曼，曾見過馬克思，當時他還是小學徒哩，如今頭髮都白了。他不懂法國語。魯易懂得法國語，多裡奧自然懂得。到武昌漢陽門起坡，僱了黃包車去第一小學，那時正在拆城，磚頭滿地，黃包車不好，老湯曼又肥重，半路上翻了車，擦破了手腕一塊皮。<sup>116</sup>

據中共黨史學者考證，在中共五大上，國際工人代表團僅分別代表英、美、法3國共產黨發表賀詞，「贏得了大會的巨大熱情，受到了暴風雨般的歡呼」，未留下其他發言紀錄。<sup>117</sup> 代表團對該會的最大影響，在於〈職工運動決議案〉中增加了「與各國工會建立親密的關係」一項：

中國革命的完成，一定要得到國際無產階級的幫助。所以中國工會應該與各國工會發生經常的親密的關係，把中國工人的痛苦及鬥爭的情形盡量的向各國工人群眾中宣傳，以取得各國工人的深切的同情與擁護。尤其是在太平洋沿岸各國工人，只有中國工會比較進步，所以太平洋勞動大會，無論如何要在最短的期間召集，並須由此建立經常的宣傳通信機關。<sup>118</sup>

自中共建黨以來歷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已指出聯合世界無產階級的目標。1921年中共一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第一個決議〉中，即已提出「派代表赴遠東各國，以便商討發展和配合今後階級鬥爭的進程」。<sup>119</sup> 中共三大通過的〈勞動運動議決案〉中，指出「大的產業工會，尤其是海員工會，須設法引起其與赤色職

<sup>115</sup> 在現有的研究中，皆認為參加中共五大是國際工人代表團的既定任務。然而，國民黨的文件顯示，代表團曾計劃提前返國，不出席中共五大與之後的泛太平洋勞動會議。

<sup>116</sup> 鄭超麟，《鄭超麟回憶錄》（香港：天地出版社，1998年），頁265。

<sup>117</sup> 〈中國共產黨第五次代表大會（譯）〉，收入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檔案文獻選編》，頁220。

<sup>118</sup> 〈職工運動決議案〉，收入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檔案文獻選編》，頁17。

<sup>119</sup> 〈中國共產黨第一個決議〉，收入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頁8。

工國際聯合」。<sup>120</sup> 國際工人代表團到訪後，使中共聯合世界無產階級的計畫大受鼓舞，因而在職工運動決議案中，格外強調了與各國工會建立親密關係。建立親密關係的主因，即為團結起來推翻帝國主義與資本主義，這種論述同樣出現在中共五大通過的宣言中：

……另外還有一種勢力使武力干涉不易實現者，就是帝國主義國內無產階級的反抗。用幾隻兵艦，數百水兵威嚇中國的時期，已經過去了。現在如果實行武力干涉中國，結果就是長期的戰爭，帝國主義國內的無產階級一定很決絕的反對殖民地的戰爭。這個方法恐不能應用了。再者，如果對中國宣戰，參加戰爭的各帝國主義國內，一定要發生嚴重的政治危機。在另一方面，全世界表同情或幫助中國的革命的實在有偉大的群眾。所有世界上的無產階級和被壓迫民族，都和為自由而戰的中國民眾站在一起。<sup>121</sup>

5月1日中共發表〈告世界無產階級書〉，再度強調各國無產階級將團結起來援助中國革命：「各國工友們！要知道帝國主義此次積極用武力鎮壓中國革命，是因為們知道中國革命的成功要給他們以致命傷；所以我們各國無產階級要起來以全力援助中國的無產階級，援助中國的革命，使世界資本主義不能穩定，如此各國工人階級的敵人的基礎就發生搖動。」5月9日，國民黨中執會致信國民政府財政部，要求撥款4千大洋給代表團，作為回國旅費。<sup>122</sup> 10日，代表團致函國民黨中執會，表達「最深的感謝」。<sup>123</sup>

代表團在中國最後的行程，為參加5月20日至27日在漢口舉行的泛太平洋勞動大會（The Pan-Pacific Trade Union Conference）。<sup>124</sup> 該大會的歷史意義，在

<sup>120</sup> 〈勞動運動議決案〉，收入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頁150。

<sup>121</sup> 〈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收入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檔案文獻選編》，頁25-26。

<sup>122</sup> 「中執會致財政部函」（1927年5月9日），《漢口檔案》，典藏號：漢7314。

<sup>123</sup> 「國際工人代表團致中教會函」（1927年5月10日），《漢口檔案》，典藏號：漢13169。

<sup>124</sup> 1926年2月澳洲新南威爾士總工會邀請各國工會代表於7月1日在澳洲召開太平洋勞動大會，因路途遙遠，出席者不多，遂改在1927年5月1日在廣州召開正式大會，經國際工人代表團團協商後改為5月9日舉行。見〈太平洋勞動會開幕詞〉，《漢口民國日報》，漢口，1927年5月27日，第3張第6頁。

於首次匯集來自帝國主義國家與殖民國家的工人代表，共同商討建立東西方國家工人的聯合戰線，打擊帝國主義與支持各國的民族自覺運動。為凸顯對這場會議的重視，赤色職工國際主席羅佐夫斯基親自到會，中國代表則為蘇兆徵、李立三與王荷波3人，湯姆曼與波利特（Harry Pollitt）代表英國參會。<sup>125</sup> 湯姆曼在會議上發表演說，介紹印度工人的情況，將中英文報紙節錄的演講內容對照，可發現內容存在不小出入，如《漢口民國日報》將湯姆曼口中英國殖民印度「三百年（three hundred years）」誤譯為「三十多年」，又將印度人口「三億（three hundred million）」誤譯為「三百多萬」，甚至出現極其誇張的語句，如「印度人每年對英國要納三百萬金磅的稅，而每個印度人所得的教育經費，卻只有一個辨士，足合中國錢幣一毫之多」一段，顯然不合常識，在英文報導中僅能找到「印度工人薪資是不到英國工人的六分之一」的句子，由此看來，中文報紙極可能對湯姆曼的發言加油添醋。根據英文報紙的報導，湯姆曼的結論是鼓吹印度無條件的解放與獨立（the complete and unconditional liberation and independence of India），這段發言，顯然超出英國駐華使領館的容忍範圍。<sup>126</sup>

在太平洋會議召開期間，中共又遭逢重大挫敗，一是許克祥5月21日在長沙發動馬日事變，重創中共在湖南的根基；二是張作霖4月搜查蘇聯大使館後，陸續公布從中取得之文件，據《鮑羅廷之罪惡》一書記載，太平洋會議召開期間「鮑氏特召一會，討論如何賄買中國報界，使宣稱北京所抄文件為偽造。此會係加倫所發起，因該文件宣布渠自俄得欸之據甚為不安也。」並提及湯姆曼出席該會。<sup>127</sup> 但湯姆曼在離開中國後發表的文章中，並未提及此事。事實上，湯姆曼在

<sup>125</sup> Tosstorff Reiner, *Profintern: Die Rote Gewerkschaftsinternationale 1920-1937* (Paderborn: Schöningh, 2004), p. 644.

<sup>126</sup> 〈太平洋勞動大會代表演講詞〉，《漢口民國日報》，漢口，1927年5月24日，第3張新聞第5頁；“Tom Mann Speaks at Pan-Pacific Labor Meeting in Hankow,” *Hankow Herald*, May 25, 1927, 轉引自“Enc. No.2 in Mr. H. Porter’s Despatch No.26 to Sir Miles Lampson,” FO371/12487.

<sup>127</sup> Eugene Pick著、朱敏譯，《鮑羅廷之罪惡》（廣州：廣州平社，1927年），頁62。同樣內容見Eugene Pick, *China in the Grip of the Reds* (Shanghai: North-China Daily News and Herald, LTD, 1927), p. 45.

8月22日完成《我在中國之所見》文稿時，似仍未知悉7月15日武漢分共一事，他在結論中寫道：

如果我們擁有一個真正的全球國際工會運動，能夠適當地聯結並從一個共同中心運作，它的力量將是巨大的。東西方必須走到一起，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人民必須像其他人一樣得到滿足。無論是黑人、棕色人、白人還是黃種人，世界工人的工會運動都有容身之地；反動的順從者將無法阻止那些對真正國際組織的需要有思想的人走到一起。這是唯一確保我們足夠應對資本主義敵人的方法，也是我們中國同志的唯一可能救贖。<sup>128</sup>

## 陸、英國駐華使領館的評估與媒體報導

湯姆曼啟程前往中國時，英國新聞認為是赤色職工國際（The Red International of Labor Unions）主席羅佐夫斯基（Solomon Lozovsky）派其前往中國。<sup>129</sup> 代表團抵達廣州後，英國軍隊甫登陸上海，總政治部亦指示擴大反英宣傳<sup>130</sup>，故英國駐廣州領事館對湯姆曼的舉動保持高度關注，在2月24日的報告中寫道：「他們受到了政府、國民黨和勞工團體的歡迎，並發表了譴責帝國主義和宣導世界革命的演講——他們被認為來訪的目的是研究當地情況、協助中國革命份子，並建立中國解放運動與世界革命勞工運動之間的聯盟。」<sup>131</sup> 英國《每日快報》（*Daily Express*）則稱呼湯姆曼為「奇怪的遊客（Strange Tourists）」。<sup>132</sup> 英國駐廣州領事館在報告中甚至記載湯姆曼參與活動的細節，如「該宴會以湯姆曼以中文演唱國民黨歌曲和國際歌結束」。<sup>133</sup> 香港的英國殖民政府對此深感警覺，評估「廣

<sup>128</sup> Tom Mann, *What I Saw in China*, p. 31.

<sup>129</sup> “Tom Mann Leaves for the “Centre of Struggles,” 1 February 1927, FO371/12419.

<sup>130</sup> 〈總政治部擴大反英宣傳〉，《廣州民國日報》，廣州，1927年2月21日，版6。

<sup>131</sup> “Visit of International Labour Delegates to Canton,” 24 February 1927, FO 371/12487.

<sup>132</sup> “Tom Mann in Canton,” 21 February 1927, FO371/12420.

<sup>133</sup> “H.B.M. Consulate General, Canton to His Majesty’s Minister, Peking,” 4 March 1927, FO371/12487.

州共產主義力量的聚會，恰當地圍繞包含湯姆曼在內的第三國際代表團訪問該城市展開」。<sup>134</sup> 久而久之，湯姆曼的熱忱看在英國官員眼裡，似乎以鬧劇成分居多，如英國廣州代理總領事布里南（John Fitzgerald Brenan）在給英國駐華公使蘭普森（Sir Miles Lampson）的報告中寫道：「我被告知湯姆曼和國際工人代表團其他成員的滑稽行為在大多數工人聽眾中引起了蔑笑，儘管官方竭力賦予他們的訪問以政治意義。在一次會議上，一名中國聽眾問曼先生，如果他如此重要，為什麼不立即爭取撤回英國上海防衛部隊。」<sup>135</sup> 英國駐廣州領事最後總結代表團在廣州的活動：「中國的自尊心（amour-propre）在代表團在這裡逗留期間所發表的言論和行動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撫慰，他們的訪問可能導致廣州勞工在莫斯科國際的旗幟下提供支援。」

在1927年3月份的政治報告中，英國駐廣州領事進一步寫道：「湯姆曼對英國帝國主義所謂的暴行特別嚴厲，並利用一切機會譴責英國向上海派遣軍隊。有關這個問題的激烈新聞輿論從代表團抵達時開始，隨著他們離開而突然停止。他們在三月初前往漢口，令人懷疑他們是否在回到各自國家後，除了招致當地中國人的輕蔑之外，還能獲得什麼，甚至可能會面臨煽動罪的指控。」<sup>136</sup> 然而英國駐廣州領事館的報告稱湯姆曼一行人於3月1日離開廣東，在譚平山陪同下搭乘火車前往漢口。<sup>137</sup> 據現有史料顯示，英國駐廣州領事館呈報3月1日湯姆曼離開廣州後，接著就是英國駐漢口領事館報告3月30日代表團抵達漢口，期間一個月代表團的行蹤，英國駐華領事館似乎未曾注意。代表團經歷種種波折，在3月30日抵達武漢，英國駐漢口領事館立刻掌握代表團抵達的消息，向上級匯報代表團「於3月30日抵達並受到政府和工人代表歡迎」。<sup>138</sup> 一份英國報告指代表團於30日抵達並與「工黨政府代表」（the Government Labour Party Officials）見面，且將

<sup>134</sup> “The Governor of Hong Kong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Colonies,” 25 February 1927, FO371/13200.

<sup>135</sup> “Acting Consul-General Brenan to Sir M. Lampson,” 21 March 1927, FO371/12405.

<sup>136</sup> “Canton Political Report for the March Quarter 1927,” FO371/12446.

<sup>137</sup> “Mov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bour Delegation,” 3 March 1927, FO371/12487.

<sup>138</sup> “Mov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bour Delegation,” 31 March 1927, FO371/12487.



於31日舉辦盛大的歡迎會。<sup>139</sup>顯然，這份報告將國民黨左派對待工人運動的立場與英國工黨視為一致。與此同時，英國駐漢口領事臺克曼（Eric Teichman）致電藍普森，指武漢的外國銀行持續關閉，理由是銀行工人持續罷工、整體工人騷亂，以及湯姆曼的出現。<sup>140</sup>顯然，在英國官方的眼中，湯姆曼在武漢威脅較在廣州時高出許多。四三事件的爆發又令英國駐漢口領事大為緊張，在報告中稱「不幸的是在此時刻惡名昭彰的外國共產黨代表團應該要正式拜訪武漢國民政府」。<sup>141</sup>5月1日，武漢勞工團體慶祝勞動節，湯姆曼發表演說，英國領事館對此報告稱：「五月一日在沒有意外平安度過，工人的大規模集會由湯姆·曼恩和其他國際共產主義者發表演說，但被遠離在租界區。」<sup>142</sup>在英國駐漢口領事館看來，湯姆曼的演說帶有煽動性（seditious），且湯姆曼已預訂5月29日前往上海的船票，領事館立即請示是否該因為湯姆曼的演說而對其逮捕。英國政府表示，單憑報紙登出的演講內容不足以作為證據，需要找到在場人士作目擊證人，但湯姆曼已搭上前往海參崴的輪船，故逮捕計畫只能不了了之。<sup>143</sup>

除了英國駐華使領館的報告，從當時相關英文報社的報導，亦可看出不同政治立場的報社對湯姆曼看法的差異。以在華英文報刊為例，對國際工人代表團持正面評價的僅有位在漢口、且由國民黨開辦的《民眾論壇》（*The People's Tribune*），該報的宗旨為「向外國讀者介紹武漢政府的意識形態和成就」。<sup>144</sup>與《民眾論壇》呈鮮明對比，著名的《北華捷報》則以嘲諷意味居多，如該報報導湯姆曼一行人抵達漢口後，「被給予法租界最高級外國酒店的房間」、「並未加入華界的中國勞工同志而是選擇待在法租界」、「有電動車可以讓他們不需走一步路」。<sup>145</sup>1927年3月27日張作霖在北京接受外國記者採訪，表示他想提醒外國駐華大使注意湯姆曼一行人在中國的「煽動目的（for the purposes of

<sup>139</sup> "Telegrams Received from China," 31 March 1927, FO371/12466.

<sup>140</sup> "Mr. Teichman to Sir M. Lampson," 2 April 1927, FO371/12481.

<sup>141</sup> "Mr. Teichman to Sir M. Lampson," 7 April 1927, FO371/12481.

<sup>142</sup> "Celebration of May-Day at Hankow," 3 May 1927, FO371/12480.

<sup>143</sup> "Activities of Tom Mann in China," 29 May, 1927, FO371/12487.

<sup>144</sup> Shuge Wei, *News Under Fire: China's Propaganda against Japan in the English-Language Press, 1928-1941*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7), p. 43.

<sup>145</sup> "Foreign Comrades at Hankow," *The North-China Herald*, 11 (April 1927), p. 152.

agitation)」。<sup>146</sup>《密勒氏評論報》(*The China Weekly Review*)僅如實引用中文報紙，表示共有30萬人參加湯姆曼一行五一勞動節在漢口的演說。<sup>147</sup>另一大報《大陸報》則報導湯姆曼一行抵達漢口的消息。<sup>148</sup>過往研究指出，《密勒氏評論報》的立場為關心中國民族主義運動，而《北華捷報》則捍衛租界內英國人的利益，特別是1920年代末期該報編輯的強硬立場，已引起不少人非議。<sup>149</sup>以報導國際工人代表團的立場而論，兩大報的態度似符合此一論斷。

英國國內新聞方面，《衛報》報導湯姆曼抵達漢口住進漢口最好的外國酒店，以及6個月前後英租界人口從1,150人降至114人，以及英租界在武漢國民政府掌控下的蕭條景象：「道路被毀，過去漂亮的河岸如今被苦力用作公廁，租界的街道被不受控制的暴民佔據，而警察完全無法控制他們。」<sup>150</sup>《衛報》同樣報導5月1日的群眾演說，稱超過10萬人參與。<sup>151</sup>《泰晤士報》(*The Times*)則報導湯姆曼一行人抵達廣州並「被奢侈地招待 (being lavishly feted)」，其口吻亦帶有調侃性質。<sup>152</sup>此外，該報亦報導湯姆曼致駐華英國士兵的信，但並未多做評論，僅在標題稱其為「煽動性的呼籲 (seditious appeal)」。<sup>153</sup>綜上所述，英國國內大報《衛報》與《泰晤士報》皆以負面觀感報導湯姆曼等人的中國行，而英國在華報刊則有不同評價。值得注意的是，《泰晤士報》、《衛報》與《北華捷報》均以湯姆曼接受奢華招待為由，調侃湯姆曼並非真心支持工人運動，而是以表演成分居多。然而，上述報導並未提及湯姆曼曾公開在漢口演說，表示他親自在外國租界內散步，才明白中國人無法在外國租界內走路的事實，故湯姆曼住在外國租界內的酒店，似非故意要與中國勞工群眾切割，更多的是出於考察目的。無論如何，從英國報紙對湯姆曼訪華的論調，很大程度反映出英國主流輿論對共產國際推行世界革命的不滿與防範。

<sup>146</sup> "Chang Tso-lin on the Present Situation in China," *The North-China Herald*, 2 (April 1927), p. 28.

<sup>147</sup> "From the Chinese Press," *The China Weekly Review*, 14 (May 1927), p. 304.

<sup>148</sup> "Envoys Of Labor From England Are Greeted In Hankow," *The China Press*, 3 (April 1927), p. 3.

<sup>149</sup> Shuge Wei, *News Under Fire*, p. 26, 32, 80.

<sup>150</sup> "Tom Mann at Hankow," *The Manchester Guardian*, 19 (April 1927), p. 10.

<sup>151</sup> "Split Forces in Southern China," *The Manchester Guardian*, 4 (May 1927), p. 14.

<sup>152</sup> "Reds" Feted at Canton," *The Times*, 22 (February 1927), p. 14.

<sup>153</sup> "Seditious Appeal to Troops in China," *The Times*, 31 (May 1927), p. 15.

## 柒、結論

1933年4月26日，陳獨秀因「危害民國」遭判處13年徒刑。<sup>154</sup> 9月7日，英國《紅旗》（*Red Flag*）雜誌登出致湯姆曼的公開信，詢問其對於陳獨秀事件的看法。湯姆曼發表聲明「當我在1927年在中國時，我參加了中國共產黨在漢口召開的黨代表大會的開幕式，我認為陳獨秀同志和他的同志們是一群有能力和勇敢的同志。隨後的逮捕和監禁發生後，我在許多公開場合強烈抗議監禁，並要求釋放所有的階級戰爭犯」。<sup>155</sup> 1934年1月，湯姆曼帶頭連署要求釋放陳獨秀，信中寫道：「顯然，對一個58歲的人判13年的刑期就是一種死刑，尤其是在中國監獄的現有條件下。我們敦促所有工人階級團體加入要求釋放我們在工人階級解放事業中的戰友的呼聲。所有抗議應寄至中國大使館，地址為W.1的Portland Place 49號，以及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媒體。」<sup>156</sup> 湯姆曼無從知悉的是，自從陳獨秀被定調為托派分子，並被開除中共黨籍後，共產國際和中共已不將陳獨秀視為同志，故案件宣判後亦未作任何表態。湯姆曼的舉動，除了證明他對國際工人運動的執著，更再次凸顯他對中國局勢的陌生，但鑒於其特殊地位，1936年湯姆曼80歲生日時，共產國際主席季米特洛夫仍親自致祝壽詞。<sup>157</sup>

本文從國際工人代表團核心人物湯姆曼的視角，探究其對中國工人運動的理解與觀察。湯姆曼在中國演講中多次強調，英國工人無比同情中國工人的處境，兩者應聯手驅逐英帝國主義與資本主義。然而，同情始終無法轉化為革命力量，自五卅事件後英國工人團體發起的一連串聲援活動，對英國政策施加不了影響，其鼓舞作用顯然大於現實作用。中國與英法美3國的勞工，至始至終沒有建立起聯合戰線，湯姆曼等人在中國煽動性十足的演說，在國民黨左派領袖看來，可能皆如譚延闓所言般「窮形盡相」。在1957年甚至有文章指出，湯姆曼在中國群眾集會上揮舞他的工會卡就能傳遞工會主義理念的想法是幼稚的。<sup>158</sup>

<sup>154</sup> 〈陳獨秀案昨宣判〉，《中央日報》，南京，1933年4月27日，第2張第3版。

<sup>155</sup> Tom Mann, "Tom Mann for the Defense of Chen Du Siu," *The Militant*, 6:50 (November 1933), p. 1.

<sup>156</sup> Tom Mann, "Protest Chen Du Siu's Imprisonment," *The Militant*, 7:5, (January 1934), p. 2.

<sup>157</sup> 〈湯姆·曼戰鬥的一生〉，《新華日報》，重慶，1941年3月16日，版2。

<sup>158</sup> Tom Buchanan, *East Wind: China and the British Left, 1925-1976*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 29.



然而，國際工人代表團出現在中國的時機，卻恰好撞上北伐的幾個關鍵時間和地點，代表團的經歷和觀察，無疑為北伐歷史提供另一個生動的微觀視角。代表團抵達廣州時，剛結束的省港罷工給英國在廣東帶來不少損失，湯姆曼的出現顯然令英國駐廣州領事館大為不安，同時廣州國民政府甫遷都武漢，代表團一行人見證了國民黨左派與中共控制下廣東的革命風潮。在北行路上，代表團遇見陳贊賢事件，了解到蔣介石與中共日益惡化的關係。到了武漢後，英國駐漢口領事館對湯姆曼的監控較廣州更為緊密，甚至一度打算因其煽動性的演講事實進行逮捕。對武漢國民黨左派而言，不論湯姆曼「世界工人大團結」的言論如何不切實際，卻能大力鼓舞武漢工農群眾，壯大武漢中央的聲勢。國民黨左派領袖不厭其煩的參與群眾歡迎大會，以及提供代表團極高規格的接待，皆說明武漢中央對代表團具備的宣傳價值的重視。

只有推翻資本主義制度，工人階級才能當家做主；只有打倒帝國主義，被壓迫民族才能得到解放，這些觀念透過湯姆曼的身分和演說，在中國得到大力宣傳。再就共產主義理念而言，早在共產國際成立前，列寧在1916年已指出：「社會革命只能在各先進國無產階級為反對資產階級而進行的國內戰爭已經同不發達的、落後的和被壓迫的民族所掀起的一系列民主革命運動（其中包括民族解放運動）聯合起來的時代中進行。」<sup>159</sup> 換言之，國際無產階級在兩條戰線上相互合作，一是「壓迫民族的無產階級」反對宗主國的資產階級，以及「被壓迫民族的無產階級」起身反對殖民壓迫，共同反對國際帝國主義，構成列寧民族和殖民地理論的核心思想。湯姆曼的中國行無疑是這個構想的具體實踐。然而事實證明，代表團的遭遇最終體現了「工人無祖國」和「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等觀念的不切實際。然而，受到共產國際為蘇聯服務的政治需要，中共在日後數年仍牢牢受這兩項口號羈絆，1929年中東路事件喊出的「武裝保衛蘇聯」和「工人無祖國」的口號，正是這一特點的延續。

<sup>159</sup> 列寧，〈論對馬克思主義的諷刺和「帝國主義經濟主義」〉，收入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著作編譯局譯，《列寧全集》，第23卷，頁54。

## 徵引書目

### 一、檔案

Great Britain, Foreign Office. Central Correspondence, Political, China, 1905-1940. London: Public Record Office (英國《外交部檔案》)(臺北,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郭廷以圖書館藏)

FO371/12405.

FO371/12407.

FO371/12419.

FO371/12420.

FO371/12446.

FO371/12466.

FO371/12480.

FO371/12481.

FO371/12487.

FO371/13165.

FO371/13200.

Tom Mann to his wife Elsie(The Early Modern and Eighteenth-Century Centre, The University of Warwick, Coventry, UK)

MSS.334/3/2/38/1-2.

MSS.334/3/2/39.

MSS.334/3/2/40.

MSS 334.8/2-3.

《漢口檔案》(臺北, 中國國民黨黨史館藏)

「向忠發致中執會函」。

「鮑慧僧致中央黨部電」。

「中華全國總工會致中執會函」。

「中執會致國際工人代表團函稿」。

「歡迎國際工人代表團等大會上中執會函」。

「歡迎國際工人代表團上中執會函」。

「歡迎國際工人代表團等會籌備處致譚組庵等函」。

「中執會致國際工人代表團電稿」。

「湖北省黨部等上中會呈」。

「鮑惠僧林祖涵致湖南總工會電稿」。

「國際工人代表團招待處上中教會函」。

「中執會致財政部函」。

「國際工人代表團致中教會函」。

《會議紀錄》（臺北，中國國民黨黨史館藏）

「二屆中央國府歡宴魯依及國際工人代表及反殖民地侵略大會紀錄」。

「二屆中央國府歡宴國際工人代表團紀錄」。

## 二、史料彙編

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一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一八九三——一九四九）》。北京：中共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劉少奇年譜》。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著作編譯局譯，《列寧全集》，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著作編譯局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檔案文獻選編》。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15年。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國國民黨第一、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史料》。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6年。

中華民國開國文獻編纂委員會、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編，《共匪禍國史料彙編》，第1冊。臺北：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編纂委員會，1964年。

王學東主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歷史文獻》。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5年。

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文獻編輯委員會編譯，《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文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8年。

譚延闓，《譚延闓日記》。北京：中華書局，2019年。

### 三、報紙

《大公報》，天津，1927年。  
《中央日報》，南京，1933年。  
《時報》，上海，1904-1939年。  
《新中華報》，延安，1941年。  
《新華日報》，重慶，1941年。  
《漢口民國日報》，漢口，1927年。  
《廣州民國日報》，廣州，1927年。  
《戰士》，湖南，1927年。

*The China Weekly Review*, Shanghai, 1927.

*The China Press*, Shanghai, 1927.

*The Daily Telegraph*, London, 1927.

*The Manchester Guardian*, London, 1927.

*The North-China Herald*, Hankow, 1927.

*The Times*, London, 1927.

### 四、期刊論文

呂芳上，〈北伐時期英國增兵上海與對華外交的演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7期（1996年6月）。

陳峰君，〈馬·納·羅易與中國〉，《南亞研究季刊》，1987年3期（1987年10月）。

Dirlik, Arif. "Narrativizing Revolution: The Guangzhou Uprising (11-13 December 1927) in Workers' Perspective," *Modern China*, 23:4 (October 1997).

Mann, Tom. "Tom Mann for the Defense of Chen Du Siu." *The Militant*, 6:50(November 1933).

Mann, Tom. "Protest Chen Du Siu's Imprisonment." *The Militant*, 7:5 (January 1934).

Pelling, Henry. "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Great Britain, 1920-9."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1958, 8 (1958).

Stoler, Sydor. "Reaction in Kiangsi." *Chinese Correspondence*, 2:8 (May 1927).

Stoler, Sydor. "A Visit To Hunan Province." *Pan-Pacific Worker*, 2 (July 1927).

## 五、專書

- 黃修榮，《國共關係史》，上卷。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2002年。
- 李雲漢，《從容共到清黨》，下冊。臺北：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委員會，1966年。
- 李 戡，《向忠發與中國共產革命》。香港：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2018年。
- 茅 盾，《我走過的道路》，上冊。香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1年。
-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編，《國共關係簡史》。臺北：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1983年。
- 羅重一主編，《共產國際與廣州國民政府關係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年。
- 鄭超麟，《鄭超麟回憶錄》。香港：天地出版社，1998年。
- 維什尼亞科娃·阿基莫娃著，王馳譯，《中國大革命見聞1925-1927：蘇聯駐華顧問團譯員的回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
- Eugene Pick著，朱敏譯，《鮑羅廷之罪惡》。廣州：廣州平社，1927年。
- Akimova, V. V. Vishnyakova. *Two Years in Revolutionary China 1925-1927*.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 Browder, Earl. *Civil War in Nationalist China*. Chicago: Labor Unity Publishing Association, 1927.
- Brunet, Jean-Paul. *Jacques Doriot, Du Communisme Au Fascisme*. Paris: Balland, 1986.
- Buchanan, Tom. *East Wind: China and the British Left, 1925-1976*.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 Chesneaux, Jean. *Le mouvement ouvrier Chinois de 1919 à 1927*. Paris: Mouton, 1962.
- Hilton, James. *Labour and Socialism: A History of the British Labour Movement, 1867-1974*. Brighton, Sussex: Wheatsheaf Books, 1983.
- Isaacs, Harold R. *The Traged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 Jacobs, Dan N. *Borodin: Stalin's Man in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 Karnik, V.B. M. N. Roy: *Political Biography*. Bihar: Nav Jagriti Samaj, 1978.
- Lovell, John. *Stevedores and Dockers: A Study of Trade Unionism in the Port of London, 1870-1914*. New York: Augustus M. Kelley, 1969.



- Mann, Tom. *What I Saw in China*. London: The National Minority Movement, 1927.
- Morton, A. L. and Tate, George. *The British Labour Movement, 1770-1920: A History*. 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 1975.
- North, Robert C. and Eudin, Xernia J. M. *N. Roy's Mission to China: The Communist-Kuomintang Split of 1927*.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3.
- Pick, Eugene. *China in the Grip of the Reds*. Shanghai: North-China Daily News and Herald, LTD, 1927.
- Powell, David. *British Politics and The Labour Question, 1868-1990*.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2.
- Reiner, Tosstorff. *Profintern: Die Rote Gewerkschaftsinternationale 1920-1937*. Paderborn: Schöningh, 2004.
- Ryan, James Gilbert. *Earl Browder: The Failure of American Communism*. Tuscaloosa, Ala: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 1997.
- Torr, Dona. *Tom Mann and His Times*.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56.
- Tsuzuki, Chushichi. *Tom Mann, 1856-1941: The Challenges of Labou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 Wei, Shuge. *News Under Fire: China's Propaganda against Japan in the English-Language Press, 1928-1941*.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7.
- White, Joseph. *Tom Mann*.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1.